

後國安法的  
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in Post-NSL Era

Vol.5  
2022 MAR

如水  
FLOW HK

VERTIGO

死在價值裏才是我的最佳結局

時代革命導演  
周冠威



後國安法的  
公民社會的



Civil Society in Post-NSL Era

ISSN 978-956-90612-0-1



9 789869 861281 >

Vol. 5  
2022 MAR

如水  
FLOW HK

背上自由之名



Enes Kanter Freedom

專訪最勇敢的NBA球星

# 呼吸

FLOW HK

後國安法的  
公民社會的



Civil Society in Post-NSL Era

# 編者的話：

作者 / 黃台仰

不經不覺，如水雜誌成立已經一年。如水全人在此感激讀者們在過去一年的支持和包容。

過去一年，香港不只繼續受疫情影響，港共政權亦無間斷地打壓公民社會，志在徹底將其清除。在數月間，超過 50 個公民團體在面對龐大壓力下宣告解散。

公民社會作為個體在政府及市場之外的空間，一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關鍵元素。如水本期將會圍繞著正被肢解的本地公民社會並探討不同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先從公民社會中的個體出發，從他們自身的經歷及思考去理解個體在公共空間中行動的目的及哲學。在沐羽訪問《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的文章中，我們了解到信仰及電影哲學如何影響著他的行動及作品呈現的風格。在另一篇訪問，NBA 球星 Enes Freedom 詳述自由之於他生命的意義，以及對自由的堅持如何驅使他成為在被商業原則主導的 NBA 中最敢言的球星。

第二部分的文章嘗試從不同層面及角度說明現況，同時亦探討在威權統治下公民連結及行動的可能性。作為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的公民自由正被政府以各種理由收窄，Billy Fung 在其文章《公民社會、安心出行和抗疫：從新加坡經驗看林鄭政府的防疫政策》中就引用新加坡的防疫政策作為例子，窺破林鄭政府如何以抗疫為名打壓公民自由。



鄭頌晴的文章《法庭內無聲的吶喊》嘗試勾劃出閉門審訊對於公民社會的影響。她帶出了現時所有與法庭相關案件的困境——在外的公民社會如何能夠為政治犯在法庭的行動帶來注意力，同時又能確保到受審者的安全？如水編委式在其文章《在牆外留下來的我們》中，以曼德拉及馬丁路德金在受審及在囚時的演講及書信對於其抗爭的影響，說明了受審及在囚者仍有政治能量。式的文章逼使我們每位在牆外的人作出反思——究竟我們有沒有認真看待他們的聲音？大家有否認真閱讀何桂藍在獄中的書信、周幸彤在法庭的自辯？

雖然嚴苛的法例，監獄的高牆及法庭的限制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但共同體並不會就此瓦解。個體間的連結是無形的、流質的、如水的。政權築起了大壩，意圖粗暴地阻隔合流，此舉卻促成了流川另覓新徑。

不猊在《囚籠裡的娛樂》中嘗試分析香港本土娛樂發展的爆發與在後國安法時代的民氣之間的關連。大眾的政治情感被非政治性的娛樂產業吸收，再以不同型態在各式各樣的娛樂載體中展現。這種轉化為共同體注入了新型態的能量。扣連彼此的，除了對家園的愛、共同的苦難，更多是流行文化的面向。除了個體之間的連結，個體與土地的連結在共同體的建構中亦不容忽視。Clarice Pang 在《香港人食香港蘿蔔糕》中便訪問了堅持使用本地蘿蔔的素食餐廳老闆。連結不單止能夠聽得到，更吃得下肚。

在第三部分，我們討論在海外港人在外地建構公民社會所面對的挑戰及如何克服。Luke de Pulford 在其文章《5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中以非港人的角度反思現時海外港人公民社會的發展。編者作為海外公民社會的一份子，認為 Luke 所指出的問題的確存在。我們都應該嘗試為這些問題提出方案，避免這些問題窒礙海外公民社會的發展。

就如本地的發展，海外公民社會的發展亦擁有不同面向。海外及本地公民社會之間的連結，亦同時發展得愈來愈深厚。在愛沙尼亞的香港人 Iverson Ng 在其文章《Immunity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 Estonian case》中便從同屬帝國邊陲的愛沙尼亞的反抗歷史中借鏡，帶出語言、歌曲及歷史之於維持反抗意志的重要性。他亦嘗試從一個作為在波羅的海三小國的香港人的角度出發，思考在不同地方的港人公民團體如何有策略地分工。

在傳統意義上，公民社會是在政府及市場之外的空間。然而，黃色經濟圈的出現，模糊了市場及公民社會之間的分界。千八女鬼訪問了在海外創業及參與港人商會的「港女」。她認為金融、經濟及商業，一直與港人身份緊緊扣連。透過商會協助海外港人創業並連結海外港商，無疑能夠對發展海外港人社群提供支持。受訪者的經驗可以讓其他有意在海外創業的港人參考，從非典型的途徑持續發展及壯大公民社會。

就本地及海外公民社會發展的討論，以上作者的焦點並非完全一致。然而，這種對未來想像的多樣性正正是構成蓬勃活躍的公民社會之重要一環。我們或許從中窺視到一個多元化及具創意的港人公民社會正嶄露頭角。

願眾人平安，榮光歸香港！



# 文章目錄

## ■編者的話

---

## ■封面人物

---

- 6 不只是殉道者  
——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 作者 沐羽
- 71 背上自由之名：重逢北京奧運無感的翌日  
電話接通了 NBA 敢言球星 Enes Freedom —— 作者 破曉

## ■本地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

- 30 公民社會、安心出行和抗疫：  
從新加坡經驗看林鄭政府的防疫政策 —— 作者 馮敬恩
- 36 法庭內無聲的吶喊 —— 作者 鄭頌晴
- 44 在牆外留下來的我們 —— 作者 式
- 56 囚籠裡的娛樂 —— 作者 不獏
- 64 香港人食香港蘿蔔糕 —— 作者 Clarice Pang

## ■海外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

- 87 5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 作者 Luke de Pulford
- 97 Immunity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 Estonian Case —— 作者 Iverson Ng
- 107 海外創業與香港人商會 —— 作者 千八女鬼

## ■書評與小說

---

- 113 夾縫中覓光：  
讀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 作者 則



封面人物

# 不只是殉道者—— 專訪《時代革命》 導演周冠威

RTIGO

THE  
ZE  
SCENARIO  
WOODY  
BY KOLAH  
WOODY ALLEN  
PRODUCED JACK ALLEN

TEN  
YEARS

同  
以  
有  
實  
前  
滿  
期  
學  
？  
解  
就  
有  
者  
編







作者 | 沐羽



Source : K 先生提供

## 不只是殉道者 ——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作者 / 沐羽

寫小說、散文、評論與報導。現居台灣。已出版短篇小說集《煙街》，曾獲文學獎若干。

從《時代革命》於 2021 年七月在坎城影展公開放映以後，導演周冠威每隔一陣子就會收到記者傳來的專訪邀約，從簡單問幾句意見到長文專訪也有。「原來真的要等到別人問，我才能挖掘出自己的內心世界，」周冠威說：「我很喜歡做訪問，因為只有訪問才能把我的潛意識帶到意識這邊……只有訪問才能說出我的靈魂。」



靈魂、救贖、勇氣與盼望，在各種各樣的訪問中，寫周冠威的文章常常都染上一陣基督教的氣息，使電影藝術跟社會事件都冠上了神學的意味。其中提到他為了電影和社會公義不顧一切的描述很多，到他公開說到自己沒有意願離開香港後，媒體大眾更為他貼上了殉道者的標籤。然而不只於此的，是周冠威在宗教語言以外，對於電影藝術的深入思考。他是一個會反思並且突破既有標籤的創作者：「其實我並不想用殉道者這個字眼，但是這個社會迫使人們要有殉道的心態才能創作，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在這次訪問裡，我們嘗試在單向的殉道標籤裡，挖掘出周冠威從宗教出發深入思考藝術的一面。





Source : K 先生提供

## 一場連綿不斷的犧牲：死在價值中是最佳結局

自二十多歲決志信主的周冠威在舉例時經常顯出他受基督教的影響，比如他會說，使徒保羅在晚年被捕囚禁，在獄中書寫的信件後來成了新約聖經，犧牲和受難能夠轉化為創造；又比如說，他在訪問中曾經提過最想拍的是一些善良的、慰藉人心和改變生命的電影。他相信信念是一種有機會帶來苦難的事，但人在受苦的過程途中是喜樂的。

良善是一種立體的存在，它的背面是惡，兩者相互依存；良善也是存在於時間當中的，它會前進以及變化。「保羅的獄中書信表達了想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的意願，他教會我們如何在受苦裡得到喜樂，」周冠威說：「而我是一個很想進步的人，於是信仰和電影是相通的，兩者都讓我成為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犧牲是基督教教義的主旋律，而周冠威的一生確實也是從不斷犧牲中走過來的。在其他訪問中提到的殉道者面向，除了《時代革命》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外，更多還是他過往對於電影藝術的犧牲。在中學畢業後，周冠威原先想要打工賺錢自學電影，但工作實在太忙，幾乎沒有學習的時間與體力，於是他重新報考公開試。這樣一考，就連續考失敗了三次，演藝學院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給他，後來再讀兩年書考上高考才成功讀到電影。從那時他就萌生了一個想法：「死在片場裡是我的最佳結局。」

然而這個想法到後來卻變化了，正如良善經歷了時間洗滌後會變形，社會事件的陸續發生也使周冠威改變了想法：「應該說，死在價值裡才是我的最佳結局。」從一四年，到一六，其後是一九的社會事件，無論是善良的，還是慰藉人心或改變生命的價值觀，被各種各樣的惡所沖刷過後都改變了形狀。「聖經裡有句話，叫作『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但是香港政府這麼多年來都讓我們生存在它的謊言底下，我非常痛心，轉而想要找個方法表達香港現在所發生的事。」而他找到的方法就是電影。



Source : K 先生提供

周冠威提到了由他所執導的《十年》中〈自焚者〉一部短篇電影，當中一名角色為抗議政府，於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自焚而死。他說，拍電影並不只想描述邪惡，更重要的是講人性光輝，而在〈自焚者〉中角色自焚的場面裡，他更刻意去掉火焰或痛苦等一切聲音，只剩溫婉的背景音樂。「這裡的火焰並不想把你推向痛苦，而是一種人性的光。自焚是一個犧牲的比喻，它是痛的，但也是光明的。如若耶穌從死亡復活，給世人帶來希望。」

## 眼淚是種複雜事物：讓電影不只是一紙文宣

在討論藝術作品的善與惡、公義與壓抑、言論自由及極權等等對立面時，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它的藝術性足不足夠，也是描繪（showing）和講述（telling）的永恆之爭。到底應該直接說出現在的社會狀況，還是要進行藝術加工？藝術加工的程度又應該去到多深？著名移民作家哈金（Ha Jin，原名金雪飛，在中國六四事件後決意留美發展）曾經寫道：「作家必須為道德立場做出選擇，反對壓迫、偏見、不公正，但是這樣的姿態必須是次要的，作家應當明白藝術作為社會鬥爭的侷限性。〔…〕許多被指控為右派的都是



作家和行動家，有些仍寫著請願書、文章以及組織會議。倘若沒有一部有生命力的作品，他們的痛苦和損失從某程度上將在集體記憶裡淡化，如果不是全盤淡化的話。」

對於藝術性不足或意識形態掛帥等問題，在《十年》放映時期已經有網上的評論者提過，引發了一陣迴響。如今到了《時代革命》，即使它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及勇氣，但必然也會有人提及藝術性和紀實之爭。而周冠威說：「如果是為了公平正義，我不介意這樣做（著重講述）。因為重點是傳遞，而在傳遞的過程裡我也能保持住藝術的立場和個性。」之所以說殉道者是一個不準確的詞語，是因為它只抓取了行為的表面，沒有把導演對於電影進行的思考包括進來。媒體把《時代革命》單純凝縮成一個簡單的符號，也讓電影被壓扁成為一紙文宣，就像只談使徒保羅的形式而不談內容，也無視了導演對於社運之餘，對於電影亦有高溫燃燒的意志。





「藝術是要有立場，要有個性，要有氣質的。而藝術高度可以用三個方向去提升，既可以削弱藝術的文宣氣，也讓它更符合人性。」周冠威以三個方向剖析了電影怎樣迴避淪為扁平文宣的陷阱，分別是辯證、謙卑跟曖昧。他舉〈自焚者〉作為例子，它是一部偽紀錄片，其中每位受訪者的言論和立場都有著各種矛盾和衝突，即使是同一立場的角色所關注的重點也並不一致。在同一作品裡有多重面向和對話，這就是他想要追求的辯證，也可以甩開文宣的味道。

從辯證延伸出來的就是謙卑，每一個人都不應該覺得自己所思所想的就是真理，而作為基督徒也應該保持質疑。「我的信仰也存在著質疑的空間，越質疑說不定就能越有信心，我們是需要有質疑空間的。」之所以提到需要，是因為這個政府已不允許它的人民再質疑任何事。最後一個方向是曖昧，到底在藝術作品裡要帶來希望還是絕望？〈自焚者〉是同時痛苦也有光輝的，帶來迷茫又帶來信心的；因此，它所留下來的是一個問號。周冠威自言喜愛用問號來思考事情，用以避免自己過於自大，才能在藝術裡追求到辯證、謙卑與曖昧的境界。

於是，現代社會和極權主義的兩大陷阱——庸俗和孤立——都被周冠威用這三個方向的思考迴避過去了，也使得他的鏡頭在火熱殘忍的高燒底下，仍能保留人性的溫暖。他的敘事是可接近的、可感的，因為周冠威能夠代入他人，而他的電影亦邀請我們進入，來理解他的信念。「眼淚是一種很曖昧的事物，」在談及藝術觀時，他特別強調眼淚這點：「我每次重看《時代革命》都會哭，但到底我是為了痛苦還是勇氣而哭？我是為人性的光輝感動還是在痛恨人性的醜陋？而這正正就是這場漫長的運動所給我的一切，所以每一次的眼淚都很複雜。」

「我重看《時代革命》時都會感到很痛苦，但眼淚是很複雜的：有些眼淚我甚至懷著敬意而流，為甚麼這些人會這麼好？這麼有愛？這麼善良，有勇氣、體貼他人，能夠堅持守住到最後一刻，我每次看都會哭。」惡的時代迫使人要作出選擇，而在作出選擇的過程當中，人就會爆發出個性。而個性加上反思性的藝術觀念，就造就了周冠威的《時代革命》：「我希望就算一百年後有人拿起這部電影看，就連是一張白紙的觀眾都能看得懂，這是我的追求。」



Source : K先生提供

## 作為系列中的個體：電影必須獨立完整

當我們提到藝術性和文宣之爭時，又會浮現出另外一組問題：一九九九年反送中應否拍成一部劇情片？周冠威也坦言曾經想過拍劇情片，但如果是大製作的話，資金會是一個問題，如果是有限資源的話，又為何不直接拍成紀錄片？「運動裡有太多故事、太多真實的人物了，我覺得他們很值得拍下來。可能劇情片我會放在十年之後拍，但唯有紀錄片是能直接抓住當下的藝術，因此，我在這場運動當中認為紀錄片優先。如果要我思考和付出的話，絕對是紀錄片而不是劇情片。」



周冠威認為《時代革命》中最有價值的是訪問，由於抗爭者信任曾經拍過《十年》的他，他就能藉此進入手足的內心世界。在拍攝過程裡，他會在抗爭的不同階段訪問同一個人，比如他分別在九月、理大圍城期間以及他移居台灣後都訪問了同一位抗爭者。而在訪問當中流露的情緒，是劇情片的虛構所無法比擬的，紀錄片的真實性就在這裡：「我覺得值得做，一定要當下做，如果隔了十年後才做口述歷史，要他們憑著記憶去講當年發生甚麼事，那個情緒已經完全不同了。」



Source : K 先生提供



而這些訪問和紀錄在剪成電影後，更成為了一種特別的存在。「在剪好電影後我去問一個手足，這樣拍能不能保護到你？他說：『沒有問題啦，這樣完全認不出我。』然後我又問：『那你怕不怕觀眾認不出你？』手足又說：『沒有關係，裡面的人我一個都認不出來，但我全部都感受到了。』」周冠威說，這使我們成為了一個整體，而這個就是運動無大台的精神，我們不一定要記住某一個人，但我們要記住這種感受，這種內心的呼喊——回到他常用的基督教修辭當中——要記住這種很有熱情的靈魂，這種承受著內心世界熱情的呼喊。「於是我就鬆開了覺得自己電影拍得不好的枷鎖。」他說。

與其說是整體，不如說是一種集體，而《時代革命》也成了集體中的獨立部件。在日後研究反送中運動時，研究者們必然避不開《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或《少年》等電影，而周冠威也認為這是正面的現象。「現場那麼大，我們又不像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抗爭那樣焦點就只放在一個廣場上，這場運動是流水式的，到處都在發生事情，那我們要去哪區？」他說：「我很慶幸有不同紀錄片，我其實非常開心有這些紀錄片的出現，這是非常令人喜悅的。因為有些事是我做不到的，他們做到；有些他們拍不到的，但我拍到。這樣對於歷史的保存是件非常好的事。」

在此同時，周冠威認為雖然研究反送中運動時必須把這些電影當成一個系列來觀看，但是每部電影必須是獨立完整的。「這是一個基本要求，你不能要求觀眾在看我的電影時，反而要去看別的電影來找資料補充，這樣有點不負責任。」在集體如水的浪潮當中，維持獨立完整的道德底線，這樣的思考如若在文宣裡維持自己的聲音，也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必須自我要求的工作。反送中抗爭的特色是無大台、如水而游牧式的，而他的藝術工作便是在如水浪潮裡堅持自己是顆折光的水珠，複雜得宛如一滴淚。



第五十八屆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  
時代革命  
周冠威  
香港人  
 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2021 年 11 月 27 日 頒贈

金馬獎

## 後記：那些無法拍攝的事情及它們的變形

《時代革命》即將在台灣全國上映，在如今重看火紅的一九年，問到周冠威最想拍而沒有拍到的片段時，他毫不遲疑地回答是機場事件。他的攝影師因為塞車而去不了機場，而事實上，被稱為「和你塞」的運動後來被演變為「港版敦克爾克大撤退」，它的影像明顯告訴了大眾，除非你有能拍攝夜間影像的航拍機或是立體移動的交通工具，否則憑一個自發的紀錄片導演實在無法進場。

此外的遺憾還有是受訪者只能重述他們的現場經歷，導演無法親歷其境。又有更多是安全考量，周冠威其實很想訪問到抗爭者的家人，這樣能讓整個故事更為立體，但如若抗爭期間一位國泰機師所說——萬事小心——這個念頭還是不執行為上。當然，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於時間限制，有很多訪問都無法收進電影當中。

不過，周冠威在訪問最後透露了最新消息，與台灣的春山出版社溝通過後，《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將於二月底上市，到時候可以透過書面形式看到當時的受訪者未被公開的一面。在這場抗爭當中帶上面罩和護目鏡的大家千人一面，它是一個集體、一個齊上齊落的場境，但正如善良，它經歷時間的沖刷過後會變形成其它模樣。而《時代革命》便從集體變形成一個個體——一個紀錄集體的個體——它的藝術性、反思以及迴避扁平文宣的工作，都使人敬佩。如若國泰機師所說的另外一句：香港人加油；又或是使徒保羅在《羅馬書》寫的：「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萬事互相效力的意思便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祝導演在亂流下平安。























第五十八屆金馬獎  
最佳紀錄片

時代革命

周冠威  
香港人



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2021年11月27日頒贈

金馬獎









本地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 公民社會、安心出行和抗疫： 從新加坡經驗看 林鄭政府的防疫政策

作者 | 馮敬恩

# 公民社會、安心出行和抗疫： 從新加坡經驗看林鄭政府的防疫政策

作者 / 馮敬恩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政治碩士。

## 前言

2020 年 3 月中，我飛抵新加坡履新。當時新加坡還未有明確的防疫方向，只是跟隨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後來疫情的嚴重幾何級數上升，於是便於四月上旬開始展開了長達個多月的「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即封城是也。後來重新開放，之後又分別短暫恢復阻斷措施，推行限聚以及禁堂食等的措施，最後順利過渡到「堅強抗疫」，與病毒共存。從新加坡的抗疫經驗中，我們看到一個選舉威權國家如何動員舉國之力，對抗武漢肺炎。

一海之隔的香港在兩年之後開展了其後知後覺的抗疫工作。儘管中國駐香港政府的抗疫政策中乏善可陳，沒有吸取世界各地的抗疫經驗，但是我從新加坡經驗中，看到未來香港政府對箝制香港人的自由的手段。因此，本文旨在以新加坡的案例，指出香港政府所可能採取的一些措施和影響。

## 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之所以在政治科學中不斷被提及，皆因它在民主化、民主鞏固 (consolidation) 以及社會運動動員等課題中都被賦予一定的角色。在 Prof. Larry Diamond 於 1994 年發表的論文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中指出，南韓和台灣的民主化與他們強大的公民社會動員能力有關。政治學者 Dr. Dafydd Fell 亦曾經在其專書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aiwan* 中指出，台灣的民主化與他們的女性平權運動、環保運動、台灣獨立運動、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之下形成強大的公民社會有關。究其因由，皆因公民社會可以籠統地理解成國家以外的自發、自主、自治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人們可以形成陸恭蕙（已投共）在 *Building Democracy Creating Good Government for Hong Kong*

所講的自主關聯網絡 (a network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而這個領域和網絡則需要以一定程度的公民自由為前提。

此前一直飽受詬病的現代化理論 (Theory of Modernisation) 中，曾經提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其中原因包括中產的出現，並繼而導致識字率的提升等。當然，現代化理論與民主化的關係在中國這種透過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 以及發展主義 (Developmentalism) 來發展經濟的國家並不適用，皆因經濟發展和中產的出現乃由國家直接或間接主導，並非自主生產決定的產物。可是也曾有學者指出，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從一個草根佔多數的三角形，變成中產佔多數的菱形。這些中產和專業人士在生產活動中逐步作出自主和專業的決定，成為初生的公民社會的雛形，繼而逐步追求在生活的其他面向作出自主的決定。從這個角度看，自由的生產決定，是孕育公民社會的關鍵，而健全的公民社會又會推動民主化的出現與鞏固。那麼，公民社會的形成需以自由為前提的說話，就不言而喻了。

## 防疫政策所帶來的隱憂：新加坡為例

隨著港版國安法的推行以及香港政府的虐政統治，舊有的「網絡」和「領域」早已分崩離析，然而新的「網絡」和「領域」的形成很有可能在現有的苛法之外再因為防疫措施而進一步遭到限制。

### 1. 出行蹤與人際網絡

新加坡為了追蹤武漢肺炎的傳播鏈，在阻斷措施之後推出 Trace Together 應用程式，並要求所有人出入任何處所，甚至是商場內的每一間商店。這個 Trace Together 的應用程式的功能越發推陳出新，甚至有疫苗紀錄以及刊登檢測結果。有一次，在新加坡 JEM 商場爆發武漢肺炎疫情，新加坡當局利用這些出入記錄以及應用程式中的藍牙探測功能，搜查出曾經在患者身邊經過的人，並在應用程式中提醒他們需要進行隔離，可謂佈下天羅地網。

可是，這種做法並非沒有問題和爭議。新加坡當局早前保證這些數據不會用作刑事罪行的調查，但是在 2021 年 1 月時，新加坡國會被「知會」這些數據同樣會交給警方作刑事罪行的調查，與先前的保證大相逕庭。及後，新加坡國會才通過另外一條法案，限制這些數據只能用於反恐等用途。



Source : 作者的 Trace Together 頁面，可以看到疫苗注射情況、檢測狀態以及藍牙偵測的人數。

放在香港的語境，安心出行可以讓政府掌握更多居民的訊息（而新加坡政府早就大量掌握，詳請可以參考 Sing-Pass），透過這個科技蒐集這些數據後，經過大數據分析，可以知道一個人的人際網絡、日常生活範圍以及消費等。那麼，任何公民社會自發形成的網絡就很容易被政府發現，以大防疫和犯罪等原因在形成更大的網絡之前撲滅，對公民社會的形成造成打擊。

## 2. 執法權力過分下放以及互相舉報

在武漢肺炎疫情中，新加坡出現了兩種新職業，分別是安全距離大使 (Safe Distancing Ambassador) 以及安全距離執法員 (Safe Distancing Enforcement Officer)。發生爭議的職業則是後者。事源有位新加坡居民 Mr. Nick Mikhail 因在其單位被投訴多次舉辦聚會，違反防疫政策，被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調查。調查期間，安全距離執法員以及警員同時進入其家居檢查。Mr. Nick Mikhail 指出這些人員在搜查其處所時並無搜查令，因此此次搜查並不合法。然而，新加坡市區重建局事後發表聲明，表示安全距離



執法員毋需搜查令即可進入、檢查和搜查違反防疫政策的單位。

同時，新加坡政府的一聯通 (One Services) 服務手機應用程式在 2020 年也推出了回報功能，讓市民回報違反社交距離的個案。一年之後，當局表示收集到超過十萬宗舉報。儘管新加坡當局並不會跟進每一個個案，但是這樣的風氣一旦形成，就會吸引市民互相監督、互相舉報。

目前，香港政府推出了限制家居聚會的法令，禁止來自兩個家庭以上的人士在私人地方聚會，違者罰款一萬港幣。可是在執法層面上，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都曾經提及不會主動執法。可是，當有政治需要，他們依然可以循新加坡的進路，以防疫為名進行沒有搜查令之下的搜查，而這些搜查的權力或會延伸至其他人員，對公民社會的活動造成嚴重干擾。在全球先進地區學會與病毒共存的時候，限制聚會此一舉動對公民社會在國安法之後的重建、轉往地下化等造成打擊。

同時，在港版國安法推出之後，舉報違反國安法的渠道正式大開，令人心惶惶。因此，如果政府推出舉報違反多於兩個家庭聚會等有違防疫措施的舉動，也會加劇舉報成風的問題。人們或會因為擔心別人舉報，在形成自主的人際網絡之時，失去互信的基礎，進一步窒礙公民社會的發展。

## 結論

從公民社會的各個層面來看，自由結社以及組織成人際網絡是至為關鍵的一環。可是，從新加坡的抗疫經驗中，這些面向都被犧牲掉。未來在香港「動態清零」的防疫方針下，很有可能同樣會出現這種情況，甚至更糟，繼而影響香港的公民社會的轉往地下或者重新興起的路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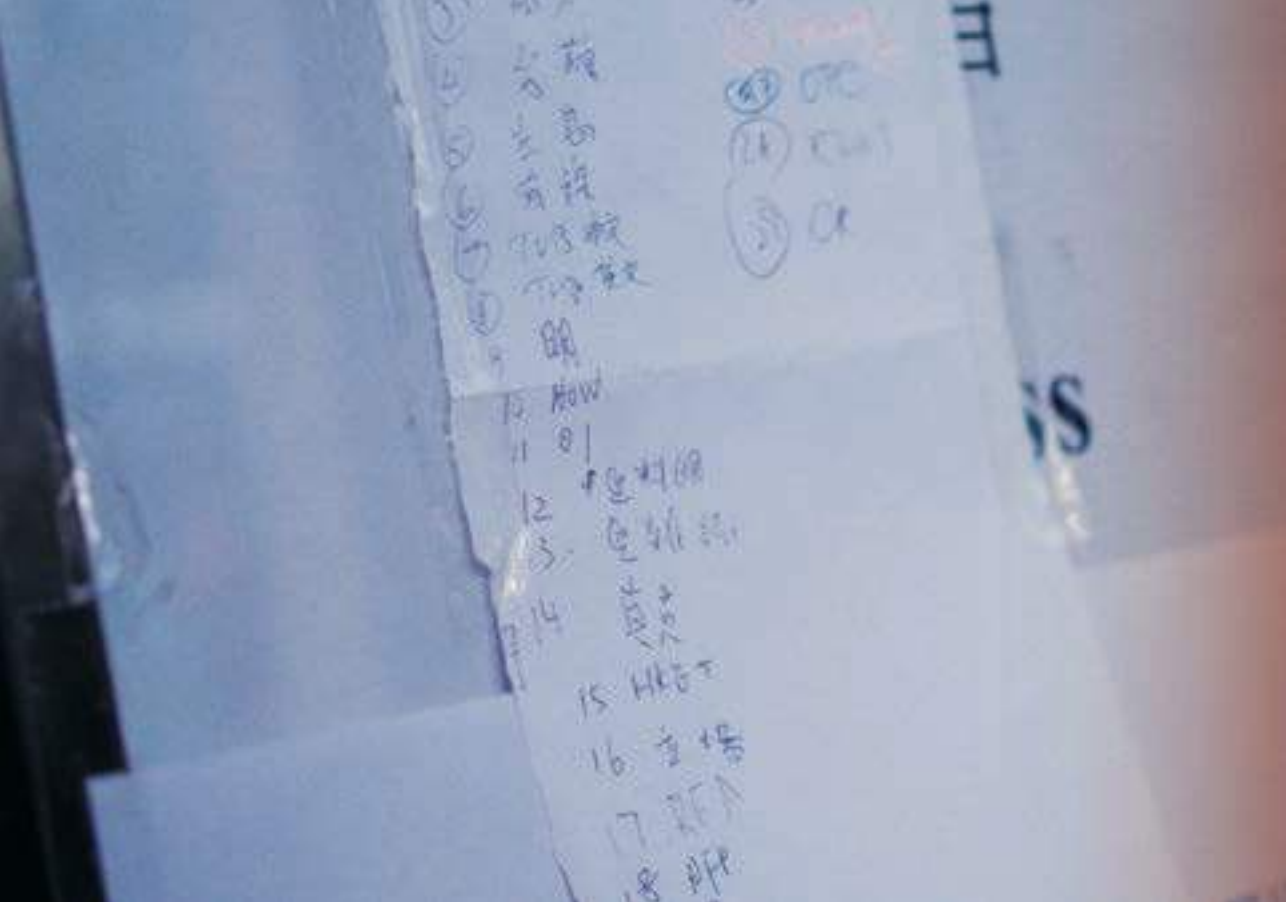
# 法庭內 無聲的吶喊

本地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作者 | 鄺頌晴



Source : Cloud

## 法庭內無聲的吶喊

作者 / 鄺頌晴

熱愛珍珠奶茶、雞蛋仔與砵仔糕的港女博士生。You cannot take the [Gong2] out of the girl.

公開的聆訊 (Open Court) 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環，羅弼時 1987 年在高等法院頒下判詞：「法院以至法官不僅要受在席公眾監察，同時亦要受傳媒監督，因為整個社會的知情權可對法院及法官構成規範……受關注的案件及法律程序，更不應限制傳媒報道，否則只會令外界質疑當中是否已偏離一般法律程序」。

現在，香港法院內每天都有抗爭者被帶上法庭，被定罪判刑的人不計其數。由於案件眾多、程序與法律爭拗十分複雜，要緊貼每日的法庭新聞相當困難。而政府有意將一些具指標性的案件變成黑箱狀態，即使國安法相關的案件仍然容許公眾旁聽，並非「閉門」，但法庭卻越來越常以其他法律程序妨礙公眾知情權。例如國安法初選案 47 人上一次（1 月 27 日）上庭時，法官引用俗稱 87A 的《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傳媒報道交付審判程序的限制和鄒





幸彤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拒絕免除傳媒的報導限制（俗稱 9P）等的法律手段，阻止在地和海外社群了解情況，從而阻止他們發起有意義的政治行動。

當然，在現在的香港談法治比對牛彈琴更可笑，但我們必須知道此類閉門審訊對運動的影響為何。

在後國安法年代，抗爭的場所有一部份轉而去了法庭，很多關於抗爭的討論或者表態，都是在法庭內進行的。例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否意指港獨（唐英傑案）、2020 年六四集會是否無大台（2020 年六四非法集結案）、群眾自發抗爭的脈絡等等的討論，都從網上世界或選舉論述的書寫轉移到法庭之中。除了「政治明星」以外，也有很多抗爭者利用在法庭求情陳情的機會，向外界表述其政治理念。這些陳辭以前主要被《立場》、《眾》等報導，通常亦會在社交媒體廣泛流傳。這些內容某程度上起著凝聚抗爭者群體的作用，令各位知道仍然有人和自己抱持一樣的信念。但隨著法庭不定頒報形式式的禁令，嚴禁傳媒報導庭內發生的審訊細節，很多資訊都不能流通到庭外，更遑論可以被轉載、激起討論。



Source : Cloud

由鄒幸彤被還押開始至 2 月 4 日，共申請 14 次保釋覆核，但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因為法庭引用 9P 報導限制，一直拒絕其免除限制的申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 47 人和很多其他的政治案件。除了台灣的《報導者》違反 9P 刊載了何桂藍申請保釋的發言全文外，幾乎沒有其他相關的陳情內容出現過。他們在庭內的陳詞作為政治行動幾乎是無效的，因為他們沒辦法接觸到外界，只有庭內的人可以看到。

政府樂於以各種手段阻止各種資訊從法庭中流出，尤其是牽涉著名政治人物的案件。隨著《蘋果》、《立場新聞》、《眾新聞》和眾多網媒前後被迫停止運作，媒體界可謂人人自危，香港的記者和媒體前所未有地少，法庭記者的數量亦明顯減少，有經驗者更加買少見少。加上法庭程序和法律觀點的爭拗非常複雜，一般人需要受大量訓練才有辦法完整理解法庭中發生的事。因此，記者報導將會對他們書寫、發佈的內容相當小心，可能甚至會傾向「少寫少錯」的心態。例如在 47 人 1 月 27 日提堂時，部分被告在歷時接近十二小時的審訊中，因為堂食限制，只獲幾塊梳打餅作晚餐，引起不滿。相關細節並沒有被大部分現存媒體詳細報導，但嚴格來說，這些內容並不受限於



87A，可見媒體在拿捏「紅線」相當小心。

至於被告的代表律師們基於專業原因並不會批評法庭安排或接受採訪，但他們往往是最了解程序和案件發展的人。被告的親人朋友亦很少對案件安排高調地直言不諱，因為這將影響被告們在獄中的待遇，一旦政府認定被告「玩嘢」，其在獄中的待遇必定受到影響，這無疑是所有關心政治案件的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如果一般人想知道有關案件的發展，就必然要做「旁聽師」。即使相當了解法律程序，假如限制傳媒報導相關內容，一個來法庭現場旁聽的人，同樣也會一頭霧水，無渠道知道申請的完整理據。以何桂藍申請保釋為例，代表她的郭憬憲大律師連口述 9P 申請的陳詞內容都被法官拒絕。公眾人士，根本完全不會明白控辯雙方想講的法律理據究竟為何。任何所得的資訊也一樣不可以公開發佈，其他因種種原因不能進入法庭的人也一樣是無法獲得相關的資訊，與閉門審訊無異。

香港的政治表述被困在一個黑箱裡面，法庭外的世界有國安法，絕少人會冒著「煽類」的風險嘗試做公共政治討論。法庭內被各種法律程序限制，即使

有人表述，相關內容也難以走出法庭。即使可以報導，香港剩下的媒體並不多，會願意報導的更少。

在地群體都難以接觸到資訊的時候，離散群體和國際社會將更加脫節。沒有足夠的資訊，要在媒體中獲得關注相當困難，要香港上新聞也需要有東西可報導。同樣地，要外國政治人物發聲，也需要有事可做有資訊可提供才有發力點。沒有任何實質的資訊，幾乎難以獲得任何政治動力（political momentum）。政治行為需要「被看見」才有意義，如果在法庭內發生的政治行動都不會被看見，則該行動就沒有效果。切斷資訊流通，阻止有意義的政治行動發生，正正是政府樂於見到的情況。政府正在企圖將政治案件置放真空狀態中，希望藉此扼殺任何與「主旋律」不一致的話語，令創造輿論向政府施壓更加困難。

最近 47 人因參與 2020 年民主派初選而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1 月 27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進行交付程序轉介至高等法院，法庭把明年 3 月 4 日列為案件的再提訊日。整個聆訊屬交付審判程序 (committal proceedings)，傳媒報導受《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所限制<sup>1</sup>，只可報道有關審訊的基本資料。這意味著直至 2023 年之前，媒體都不能報導有關該案件的任何細節。初選案是除去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一案之外，最吸引海外媒體、政治人物關心的案件。因為此案的審訊、定罪門檻以及判刑都具有指標性的影響，有助國際社會理解香港政府和北京如何「畫國安紅線」、法治是否完全壽終正寢、對於異見者有多嚴苛或寬鬆等等的議題。

國際社會是非常善忘的。外國媒體在香港仍然有重要性的當下當然希望報導 47 人案，但在 2023 年之前都不會有實質的庭審內容可以報導時，外國媒體很難不斷重複報導「47 人在某個時間點又上庭」。外國政治人物在無辦法接觸到相關資訊的情況下，連在立法機關動議表示憂慮也很困難。不知道法庭內發生什麼事，其實是不知可以憂慮什麼，總不能每次都只說「對 47 人要上庭表示憂慮或譴責」，遑論採取更具體的行動。俗語話「政治一日都嫌長」，到了 2023 年，到底國際社會還會有幾多注意力分給香港？或者到 2023 年之前，可以用什麼方法將國際的鎂光燈留在香港的身上？



要打破黑箱，唯一的辦法就是令資訊可以公開流通。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由海外的知情人士違反相關限制，公佈資訊或者在閉門會議之類的情況下告知相關人士。但當中牽涉很多的安全問題，例如如何確保與在地人士的聯絡安全，即使公布資訊後都不會將任何人置於危險當中，分享（retweet、share）相關內容的人會不會也惹上麻煩？另外，違反相關限制後會否成為法庭真的進行閉門審訊的理據，令資訊更加難以流通。如果海外的香港人社群要繼續以本地為運動中心，就一定要處理這個問題，同時透過海外的各種行動繼續向政府施壓。即便行動未必帶來即時的效果，維持對香港的關注也對政治犯來說有所保護。

1. 案件一旦進入交付審判程序，傳媒報道受香港法例第 227 章《裁判官條例》第 87A 條限制，只可報道有關審訊的基本資料，包括：
  - (a) 法院名稱及裁判官姓名；
  - (b) 案中各方及證人的姓名、地址、職業及年齡；
  - (c) 被控人被控告的罪行或其摘要；
  - (d) 在該程序中受聘的大律師及律師姓名；
  - (e) 裁判官將被控人交付審訊的任何決定，以及裁判官處理被告人並沒有被交付審判的案件的任何決定；
  - (f) 被控人被交付審訊的控罪或其摘要，以及交付所至的法院；
  - (g) 延期所至的日期及地點；



本地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 在牆外 留下來的我們

加口

香港人加

光復

香港

作者 | 式



Source : Cloud

## 在牆外留下來的我們

作者 / 式

政權透過司法系統築起的恐懼管治最根本的目的從來只有一個，就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 何桂藍





香港政府怕活躍的公民社會，怕有生機的公共空間，亦因此懼怕受審與在囚的抗爭者的聲音。當大量的抗爭者與社運領袖陷於長期審訊以及囹圄之中，政權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防止他們把審訊與坐牢轉化為政治抗爭力量？無奈的是，正如鄭頌晴在本期《如水》的文章所指，政權似乎比香港大眾更早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因用 87A 及 9P 等各種法律條例意圖收窄抗爭者發聲的空間並阻止牆內的聲音傳出牆外。當然，留在牆外的我們從來都是關心牆內的手足的：旁聽、追車、寫信、籌募物資等等，都一直有有心的手足在做。然而，我們或許一直未能理解牆內的聲音的政治能量，而當我們覺醒之時，才發現政權早已建出一道高牆在我們之間。但也許為時未晚。在囚者與囚外人士的資訊尚算流通，而本地港人仍可與海外港人合作，記錄並傳播法庭審訊內容。但若要讓一切成為可能，我們必需先認清受審與被囚者的聲音為何重要。

若說到左右一國命運的政治審訊，則莫過於在 1964 年把曼德拉以及一眾非國大 (ANC) 領導人判以無期徒刑的里沃尼亞審判 (Rivonia Trial)。而在這場歷時一年的審訊中，最具標誌性的則是曼德拉在被各船塢上長達三小時的自我辯護發言。在那三小時中，曼德拉捍衛了非國大的政治綱領，申述了他們整場政治運動的正當性，鋪陳出南非的民主前路，並作出這段結語：

我一生致力於非洲人民的這場鬥爭。我反對白人統治，也反對黑人統治。我懷有一個民主和自由的社會的理想，在這個社會中，所有人將和諧地生活在一起，並享有平等的機會。這是我希望為之生存和實現的理想。但是，如果需要的話，那是我準備為之犧牲的理想。(But if needs be, 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隨著曼德拉被判入獄，其他非國大的領袖亦均被收監或流亡，在 60 年代南非政治運動的確一度沉寂。然而，整場審判備受國際社會關注。在審判後國際奧委會與 FIFA 等均取消了南非的會員資格，而西方各國亦採取了大大小小的制裁行動。國內抗爭的烽火在 70 年代再度燃起，曼德拉亦於 90 年出獄。南非終於 1994 年迎來第一場民主選舉，而曼德拉在 1964 年的自辯，可說是這條民主路的奠基石。

若然曼德拉的發言是當代最有份量的自辯演講，當代最有份量的獄中書信莫過於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獄中寄出的信。在 1963 年，馬丁路德金因在伯明翰抗議種族隔離政策而被捕入獄。當時外部有不少人對其公民不服從運動作出了不少質疑，而運動內部既有人想放棄，亦有人想把運動升級為暴力抗爭。馬丁路德金從獄中寫信回應了種種質問，並重申且捍衛非暴力抗爭與公民抗命的原則。信的開首即包含了最廣為香港抗爭者所引用的一段：

**Injustice anywhere is a threat to justice everywhere. We are caught in an inescapable network of mutuality, tied in a single garment of destiny. Whatever affects one directly affects all indirectly.**

馬丁路德金的這封信造就的不僅是當時的平權運動。這封信成為了每一個想進行非暴力公民抗命的人必讀的書信，影響力可謂超越時空。曼德拉的自辯之所以有份量，是因為那是一段押上自己性命為賭注的講話。馬丁路德金的書信之所以有渲染力，是因為他正正在為對抗不公義而付上其代價。但同樣重要的是，正因曼德拉的發言被推上了國際舞台，亦正因馬丁路德金的信被抗爭者廣泛並仔細閱讀，他們的聲音才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美國隊長 2.0 馬俊文在被判刑之際，決定使用其求情信表明他堅定的志向並呼喚香港人不要放棄。在我看來，這段文字的重量不比曼德拉的文字來得輕：

在囚期間，我亦見盡許多香港人灰心喪志，或回歸現實，或移民海外。或許，我們都是太功利之人，以為不用付出高昂代價，就能換來無價的民主公義。還好，我仍看見尚有不少人心懷抱負，願意為這片土地拋頭顱，灑熱血。擁抱時代的呼聲，如像黑夜中點燃了一顆亮光，在這處引領陌路人，讓我感到希望，讓我不再孤單……法官閣下，對於我過去的所作所為，我不感羞恥，毫無悔意。我亦承諾，在追求民主公義的道路上，我唔會有半點懦弱。今後，我會盡我所能，用盡畢生精力，為著自己心中所信之夢想而進發，願榮光歸香港。

願大家在  
亂流下  
平安。



保重！



我們要問的問題，不是他們的文字與聲音有多大的價值，而是我們在牆外的人有多認真看待他們的聲音。當然，不是每場自辯都能扭轉國家的命運，也不是每一封書信都能改變運動的走向。若果我們把牆內手足的聲音當作遊說或其他政治手段的工具，那我會說這是焦點錯配了。也許牆內的聲音的真正本質與重要性，只有在這份自由被完全剝奪之下，才能以最純粹的姿態呈現出來。位於美國境外的關塔那摩灣 (Guantánamo Bay) 拘押中心，一度以無視被囚者權利而惡名昭彰。被囚者大多根本沒有獲得審訊的機會，亦被斷絕一切與外界的來往。一些被囚者在絕望之下開始寫起詩來，不過這些詩卻大多被美國政府視為威脅國家安全而銷毀。其中極少數的詩由義務律師帶了出來，並收錄在《Poems from Guantánamo: the Detainees Speak》一書中。Jumah al Dossari 曾被扣押在關塔那摩灣五年之久，並於其間曾嘗試自殺十三次之多。他在獄中寫下的其中一首詩，名為〈Death Poem〉：

**Take my blood.  
Take my death shroud and  
The remnants of my body.  
Take photographs of my corpse at the grave, lonely.**

**Send them to the world,  
To the judges and  
To the people of conscience,  
Send them to the principled men and the fair-minded.**

**And let them bear the guilty burden, before the world,  
Of this innocent soul.  
Let them bear the burden, before their children and before  
history,  
Of this wasted, sinless soul,  
Of this soul which has suffered at the hands of the “protectors of  
peace”.**

對與外界斷絕聯繫、失去生存盼望的 Dossari 而言，到底寫這樣一首詩有什麼意義？他應該沒想到這首詩能傳出囚牢之外，大概也沒思考過什麼政治盤算。但即使如此，死亡之於 Dossari 也不僅僅是解脫而已。Dossari 更希望的是通過他的死去審判這個不公的世界，以他的屍體作為媒介，讓外界的人受到良心的責備。這份心情背後的不單是憤恨，更是渴望與其他人連繫，讓其他人聽到他的聲音。

關塔那摩灣的詩章或許沒法像曼德拉的自辯一樣扭轉任何群體的命運，也沒法像馬丁路德金的書信一樣延續或啟發任何的運動。大部分的詩章甚至在流傳出來之先就被銷毀了。但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在這些詩句之中看到在囚者純粹想與他人連繫的心情。這份心情毫無政治盤算，亦早已超出工具理性的框架。他們單純想向這個世界呼喊：他們要宣告自己的無罪，要審判虐待他們的政權，要讓其他人感到良心的愧疚。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理解這份心情？

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在其《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以一整章的篇幅解釋行動 (action) 與發聲 (speech) 為什麼是我們作為人不可或缺的條件。根據鄂蘭，人之所以為人，在於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特殊的個體。當我們無法活出我們的特殊性，我們就不復為人，無異於一部機器。但我們如何才能活出我們的特殊性？鄂蘭提出了行動與行為 (behaviour) 這兩個對立的概念。勞動與工作都是有規律的行為，作為一個勞動者，我們只會與千千万萬的其他勞動者融為一體，根本無法體現我們的特殊性。與之相反，當我們不單單是為了糊口而是為了改變這個世界或者為這個世界帶來新意時，我們就在行動。與勞動相反，行動並不能被任何規律所捆綁，因為行動改變的正正是現有的框架。行動的希臘文為 *archein*，據鄂蘭的解讀，一度有「開端」及「開始」的意思。但根據鄂蘭，行動所展開的並不是這個世界或者任何事物的開端，而是行動者這個人自身的開端。行動展開的是這個人生命的故事，而一個人的本質也只能透過行動來展現給其他人看。換句話說，若一個人無法展開或參與任何行動，我們也無從說起這個人是一個怎樣的人，這個人也就等於沒有活過於世上。

正因如此，行動必然伴隨語言。若然沒有語言去詮釋該行動，這行動也就無法展開這個人的故事，而我們也無法確定這是行動而不是一個機械式的行為。亦正因如此，行動必需展現於人前才會變得真確。畢竟，每一個故事都需要其觀眾。對鄂蘭而言，公共空間正正是提供了每一個人在其他人前行動的機會。在一個沒有公共空間的社會，只有當你作出史詩式的舉動時，才能吸引其他人的注意，所以一般大眾根本沒有展現自己的機會。但有了大家都參與公共空間的時候，每一個人也可以在其他人的面前展現自我並一起作出行動。參與政治固然有其工具性，但因為參與政治亦即改變這個世界現有的格局，參與政治是每一個人能夠行動並在其他人的面前展現自我的方法。

有不少後來的學者都批評鄂蘭過份把公有及私有領域二分化，忽略了經濟及私人領域中行動的可能。確實，我們也不必全盤接受鄂蘭的理論並貶低各種以經濟手段作出的抗爭行為。但是鄂蘭讓我們更充分理解到 Dossari 的沮喪。在法庭上作出抗命的自辯，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行動。自辯者或許無法估算自己的發言會對整場運動的發展或這個世界有多大的影響，但在自辯之時，他就活出了他的自我。他那一刻再不是一隻待宰的羔羊，也不是一個唯命是從的機械人，而是一個確確切切活著的人。Dossari 的沮喪在於他連行動的機會也沒有了。他不論做什麼，也無法展現在任何人的眼前。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會寧願以一死換取行動的機會，並幻想自己的死亡成為他最後的行動，並以屍體訴說他的故事。

香港的在囚者雖然或許無法像曼德拉或馬丁路德金一樣公開自辯或在書信中暢所欲言，但也還未到 Dossari 的境況。從鄒幸彤與法官對法庭的限制的爭辯到何桂藍寄出來的書信，都能看出他們依然勇於並希望繼續在重重限制之中繼續行動。問題是，我們有好好當他們的故事的觀眾嗎？我們有與他們一起行動的勇氣嗎？我們有付出散播他們聲音的勞力嗎？或許在時代變遷與政權打壓之下，香港的「反抗共同體」早已轉型。也許我們的共同體現正通過黃色經濟圈以及追逐不同的本土明星所延續。我們也無法預計他們的故事對我們的海外倡議工作有多大的作用。但若然我們這些在牆外留下來的人依然視牆內的手足為我們這個共同體的一部分，若然我們想對抗政府把我們分而治之並消滅公共空間的管治策略，那我們不僅僅是要關心牆內的手足生活狀況，也要把他們視為繼續能與我們一起行動的手足，並把他們的聲音記錄下來，廣傳出去，並認真回應他們的呼喊。



Source : Cloud

何桂藍於去年九月從獄中以《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為題投書明報。以下以她信中的一段文字作結：

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份，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份，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以突破壓迫的姿態去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如果她仍然存在——就是由一個個仍未受威權同化的自我所組成。那個你想見到的香港，並不存在於任何政治人物、抗爭領袖、任何投射對象身上，而是活在每一個認同這個共同體的人的生命當中，是我們每個人的一部份。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共勉之。



# 囚籠裡的娛樂

本地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作者 | 不貌





## 囚籠裡的娛樂

作者 / 不貳

疫情與國安法雙重打壓下，香港在過去兩年陷入無盡深淵。一方面防疫政策不斷蠶食個體自由，壓抑意志；另一方面港共屢屢祭出國安法使公民社會分崩離析，許多熟悉的人、事、物或解散或被直接囚禁。時勢真惡，每個人身邊不是有著離港移民的親友，便是正打算離開。去留不僅是一個長期熱門討論題目，更成為一種詮釋「香港」差異的現象。

離開的人與留下來的人之間的差異，可以從近期何桂藍的一篇文章窺探一二。何桂藍在 Patreon 上一篇文章〈內疚是不是會令人感覺變鈍？〉與藝術家白雙全商榷，因為白雙全選採了他與何桂藍的通信創作，刊登在明報。然而何桂藍認為白雙全懷抱過重的愧疚，詮釋獄中的她「故作輕鬆」，並說無法以日常的語言回覆她。即是白雙全創作一刻，他已認定獄中的人只能終日恐懼，僅能透過信紙被刪去的錯別字或字句釋放內心真實情感。

我們即使身在牆外，或身在香港外，但是何處不是囚籠？囚籠內外的張力一直存在，並愈演愈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歷史押了韻，過去一年香港本土娛樂發展卻迎來爆發，電視劇、綜藝節目以 Viu TV 為首，Mike 導推出的〈ERROR 自肥企圖〉被認為以綜藝探討娛樂與人心的關係。廣東歌壇亦百花齊放，組合「MIRROR」引爆追星熱潮，把銅鑼灣變成「姜濤灣」。然而另一方面，香港亦終於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禁片，一批反映反送中運動的電影無法在香港上映，只能海外飄流，周冠威《時代革命》奪得去年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任俠、林森合導的《少年》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定居澳洲多年的羅卓瑤以雨傘運動為題的《花果飄零》奪金馬獎最佳導演。而留下來的人可以看《梅艷芳》，票房斬獲甚豐，但不少評論直指電影選擇性呈現梅姐生平，隱去她當年參與黃雀行動營救六四民運人士，以及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史實。新導演想拍片言志，不過電檢擁無上權力，動輒要求導演刪剪內容，否則無法公開播映。參加鮮浪潮的短片〈執屋〉因為電檢要求刪剪，最終無法播映。縱觀去年青年導演中唯有楊建邦《十二點前我要返屋企》取理大圍城期間眾人的心理狀態，化為人物心象間接拍出年青人承受難以磨滅的創傷，而又幸運地透過鮮浪潮公開放映。

何以興盛與禁忌並存？囚籠內外言志的人即使心同此理，卻總有暗湧起伏，既然心存愧疚，而又沉浸於娛樂享受——分裂的香港，就是當下的現實。我們身處當中就是一片一片的破碎微物，物欲裡縱橫，內心期待與大家重聚。

我係香港人  
不唱走那歌

像巴勒斯坦導演蘇萊曼 (Elia Suleiman) 的《那裏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最後一幕鏡頭定在巴勒斯坦一間的士高內，巴人少男少女在內勁舞。你以為以巴衝突的戰爭狀態都見不到，但是他們即使生於戰亂之地，也會像一般人想玩、娛人娛己。於是在怪異的氣氛下，鏡頭切換到的士高外，受聲浪吸引的軍車停下來，兩名以色列青年軍人隔窗盯著裏面，忽然兩人都不由自主地隨節拍搖晃身體。

娛樂何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要先承認一點：娛樂無人可以擺脫。娛樂即使使人盲動，但確實能夠打破某些藩籬——當然蘇萊曼刻意留白的是，歌曲播完後，他們會回復正常。

## 接收與再創造

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說：「他們能夠認清現實……轉而認為這是一件理所當為的事情；並不是先喊個原則，然後身體力行。他們行動在先，才從行動中找到邏輯。抽象原則是實際行動的孩子，而非父母。」（《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一無大台，二無綱領，香港民間在 2021 年不斷把民意民氣轉入娛樂產業，其行動模式大概可以歸納為民意把閱讀娛樂產業推出的文本，吸收並加以再創造，意圖達到與他者聯結的效果。畢竟疫情與國安法雙重打壓下，民間遑論具體動員反抗，連基本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都被打散，每個人的心靈何其孤獨。如「姜濤灣」，如網上眾多後援會群組，打破疫情限聚令，眾人都有了心安理得在街頭上與人相聚的理由。如是者去年眾多娛樂產業的文本，受此影響下，不少流行文化文本都不約而同取材港人當前面對難關。

以廣東歌在去年的爆發為例，大紅的歌曲當中不少都指向幾種情感——去留掙扎（Rubberband〈Ciao〉、MC Soho&Kidney〈係咁先喇〉、張敬軒〈On My Way〉、C AllStar〈留下來的人〉）、離散思考（岑寧兒〈風的形狀〉、〈勿念〉）、堅守信望（泳兒〈荊棘海〉、Dear Jane〈聖馬力諾之心〉）。九十年代也面對回歸「大限」，加上世紀末情緒，當年也有不少探討去留的歌曲，然而當年樂壇仍然以「四大天王」或王菲等人的情歌當道，而今日樂壇卻似乎以離散去留題材歌曲為主流。除了有民間閱讀追捧，其實也可以理解成今天的廣東流行曲，離散即是流行，香港流行離散，故此流行樂產業也有同樣傾向，隱晦地帶出當下現象。





## 詮釋香港的角力

與此同時，2021 年香港娛樂文化也迎來另一種變化——離散與催逼出流行娛樂興盛，但那種興盛很快便面臨來自大灣區的角力。去年香港藝人亮相中國多個綜藝節目，並有意識地自我重新命名為「大灣仔」、「大灣妹」，組軍參與中國綜藝。離散意味打開缺口，打開缺口意味香港詮釋角力步入新的格局，方興未艾的本土娛樂即使比起大灣明星陣來得更由下而上、更有機，但是目前所見，本土娛樂發展的活力與脆弱可說是一體兩面。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雖說廣東歌復興，本土娛樂產業爆發，爭論也隨之而來。像 Viu Tv 終究無法擺脫其官方認可的持牌電視台，Mirror 猛車邊拍政府廣告催谷「完善後的立法會選舉」、從 2019 年延燒到現在的「黃藍爭論」、海外港人與在地港人之間的理解差異，抗爭不再，情感轉入其他範疇，能否以某些教條一言以蔽之？我們彼此渴求理解與重建連結，然而創傷與挫敗使感情無所適從，終於再次爭論與無法理解彼此。

如果以對抗大灣仔大灣妹，高舉團結本土文化人的大旗是不切實際。究其原因，我們的心經歷 2019 年後不再柔軟，情感動員來得快去得也快。只是必須點明一件事，詮釋香港的權力隨時有可能被官方定義的娛樂事業所取代，而對不少港人來說，這可能是一條出路，像林曉峰憑大灣仔找到事業第二春，像莫文蔚如此遠離政治的歌手也自號為大灣妹。上至徐克，下至林超賢等香港中生代、上世紀新浪潮導演也在合拍片模式當中找到自存之道，他們可以在愛國動作片《長津湖》、《紅海行動》等大肆發揮港產片精亮的動作設計，爆破效果，他們一定明白過去港產片言志的生猛活力，早由主旋律取代，但是他們並不介意，只要有資源讓他們在技術上滿足獵奇與野心便夠。

分裂是現實，現實即是多片分裂的鏡，我們是破碎微物，惶惶終日，牢籠不僅限於監獄，無日無之地惡化的社會亦是牢籠。海外港人與留下來的人要明白，分裂無可避免，但是在關於我與他者的關係上，不妨採用立陶宛猶太哲學家 Levinas 的思想。Levinas 是二戰集中營的倖存者，融合猶太哲學，挑戰海德格的存在哲學，提出以他者為中心的思想。簡單來說，我從他者處自有一種責任要背負，他者是我的自我，並非我們累積的知識帶領人走向未來，而是我們以愛與倫理責任包覆的知識可以帶領。要理解 2019 年後的香港，我隱晦地覺得，以「我」為出發點理解那個地方，總存在難以解決的謎語，也因此就像去年的一部香港舞台劇名字一樣，《有你，故我在》。有你，我才會存在，在世上無數個無止境地艱難的地方生存，看見他者的臉孔，才可理解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不僅僅是娛樂，所有發生在香港的流行文化現象，讓你看得到他人之顏，更重要的是讓你知道還有人存在於此地。

# 香港人食香港蘿蔔糕



本地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作者 | Clarice Pang



Source : 素食自助餐廳「無肉食」負責人楊應邦 (阿邦) 第二年用上本地蘿蔔造蘿蔔糕，望大眾有多一個機會品嚐本地農產。(Clarice Pang 攝)

## 香港人食香港蘿蔔糕

作者 / Clarice Pang

對許多香港人來說，能跟摯親一起相聚，吃著蘿蔔糕過節，在農曆新年變得格外奢侈。年廿八（1月30日）傍晚6時半，相約素食餐廳「無肉食」老闆阿邦做訪問。受疫情及限聚令影響，全港所有食肆在6時後禁止堂食，他所經營的素食餐廳變得冷清。然而餐廳門口，不時出現市民前來領取「香港蘿蔔糕」，餐廳職員一邊招呼客人，一邊按訂單數量將賀年糕點放入紙袋。餐廳內外的氣氛，形成強烈對比。

「最近餐廳的生意大跌了7成！唉，大家都在守住，咬緊牙關堅持著。」阿邦一臉無奈地說，少了堂食生意，唯有盡量宣傳網購及外賣服務。令人鼓舞的，是今年香港蘿蔔糕的訂單，由去年2000多底大幅增加至今年的3000多底，升幅達5成多。他形容「係意料之外」，成了生意低潮期的救命草。



「香港蘿蔔 HK ROBERT GO!」計劃由田野及眾多支援本地農業的有心人於去年發起，「無肉食」第二年參與該計劃，目標是連結上、中、下游的農產銷售網絡，即上游的農夫生產者，中游的零售商店及加工單位，以及下游的消費者。

縱然本地等蔬菜自給率，由 1990 年的 30% 大幅下跌至 2020 年的只有 1.6%，農業日漸萎縮的數字背後，依然有一群人在深耕細作，讓大家吃到新鮮的農產品。阿邦說，在疫情下，能享用優質食材顯得特別珍貴：「最重要是讓大家了解到，香港仍有人在默默耕耘，為大家種出新鮮美味的農產」。

由於欠缺接觸消費者渠道，以往農夫只可以把蘿蔔拿到批發市場出售，每斤大多只能賣 4 至 5 元，從產量到實際賣出去得到的利潤都是「估估下」，有時遇上霜凍等極端天氣，甚或動物來襲，隨時失收，收入更加沒有保障。中、下游的店舖及消費者亦不知道蘿蔔究竟是怎樣種出來，跟農夫的辛勞耕作，仿佛成了兩個平行時空。農夫本屬社區一份子，計劃同時希望社區能重新跟農夫連結起來，故在店舖出售的每條香港蘿蔔，也貼上產地資料，讓大眾知道有多一種途徑支持本地農產。

這個計劃踏入第二年，共有 13 位農夫參與種植，另有 30 多家小店及餐廳參與零售及加工生產。農夫來自天水圍、打鼓嶺、八鄉等地區——他們由播種、施肥到收成農作物，足足花 80 至 90 天種出一萬五千斤的遲水大蘿蔔。每條蘿蔔起碼有 3 斤多重，肥肥白白，有些更重達 5 斤。

阿邦解釋，餐廳的角色，是跟農夫承包一定的作物數量，變相參與規劃種植，共同分擔農夫面對的風險，「我地好肯定咁同農夫講想要幾多斤蘿蔔，令佢地可以將產量需求分給其他農夫去種植，同時令餐廳可以收到穩定的貨量」。他指出，這種協作方式有兩個好處，首先可以確保到承包的產量，令農夫有信心規劃種植，第二是商議好蘿蔔批發價，大批預訂，餐廳可以早些預算成本。

回想參與計劃前，阿邦習慣從批發商購買大陸蘿蔔，每條大小相約，已洗淨包好，直送到餐廳工場處理。改用本地蘿蔔後，他要請司機運載蘿蔔到煮食工場，預算運輸路線及運費開支。此外，餐廳收到的蘿蔔來自不同農場，大小形狀不一，表面沾有泥巴，要額外聘用人手清洗蘿蔔。

眼前種種的工序增加了成本開支，然而阿邦認為值得：「因為本地蘿蔔真係



Source: 香港蘿蔔糕，表面灑上香脆金菇絲和冬菇片。(照片由無肉食提供)



Source: 素食自助餐廳「無肉食」負責人楊應邦(阿邦)第二年用上本地蘿蔔造蘿蔔糕，望大眾有多一個機會品嘗本地農產。(Clarice Pang 攝)

特別好食。我聽農友話，大陸嘅蘿蔔味道遠遠不及本地蘿蔔香濃，係因為用了化肥催谷，個多月就有收成，外表可能好好睇，但食落就會知道好唔同」。他憶起早前訪問，在中環街頭手捧大蘿蔔拍攝新聞照，旁邊有菜販大嬸問他蘿蔔怎麼賣，他說 20 蚊一斤，對方嘩言：「這比大陸蘿蔔貴 5 倍！」然而，該餐廳蘿蔔糕每盒重 900 克，售 138 元，與市面許多同類賀年糕點價錢相約，「相比起幾蚊一斤的內地蘿蔔，香港蘿蔔無疑是價錢比較高，但我們也沒有將成本轉價給消費者。」他特別將原條本地蘿蔔放在餐廳門口作介紹，讓市民看見本地蘿蔔可以重達 4 斤，售約百元，而多付幾十元，便可享用本地蘿蔔糕。

即使有些蘿蔔被小動物咬了幾口，破了相，餐廳也會照買下來，不浪費。「批了受損部份，只要懂得烹調，也不會影響質素啊！」

為了使全素蘿蔔糕食落富口感，該餐廳的廚師刻意將蘿蔔連皮切成粗條，再加入炸至金黃色的金菇絲及冬菇粒，令蘿蔔糕更加香口。今年該餐廳提早於網產推廣賀年糕點，成功吸引更多消費者於網站預購，他估計年輕消費者比較熟習網購，故年輕客戶人數有明顯增加。

彎腰翻土、深耕細作，農夫悉心種植令蔬菜，對阿邦來說並不陌生——其母親曾經種田，他早就嘗過親手摘下來蔬菜鮮味。不過，自從參觀過本地農場，跟農夫聊天後，他深深受到啟發，「曾有一位農夫說過，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市場每天都在炒炒賣賣，但這些數字是變不到糧食出來的，蔬菜總要有人種出來，然而，香港地、農夫的角色長期不受重視，要長期依賴糧食入口，對一個城市發展來說，極不健康」。

性格溫文的他，手抱著 4 斤多的蘿蔔拍照，如抱嬰兒一樣，眼裡顯出絲絲溫柔。原來最近他當爸爸了，女兒現在 4 個月大，這個新年首次一家三口渡過，別具意義。

當香港經歷新一波移民潮，許多人都重新思考家在何處，人心惶惶，這位新手爸爸，天天學習照顧幼女，面對角色的轉變及餐廳業務的挑戰，卻能從蘿蔔的種植過程中得到力量。

他說：「我們不能控制大環境，只能專注當下，做好自己，就好像農夫種植一樣，不求控制大自然環境變化，但求專注翻土、施肥和灌溉，照顧好種子當下的成長，盡力就無悔」。談到新年願望，他希望疫情盡早過去，家人身體健康，女兒長大後能跟自己一樣享用新鮮的在地食材，煮出健康的食物，就心滿意足。



# 《如水雜誌 Flow HK》

2022 MAR Vol. 5 「後國安法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in Post-NSL Era

編輯委員會 黃台仰、張崑陽、鄭頌晴、江旻諺、鍾榮豪、Billy Fung、式、言

編輯顧問 羅冠聰、吳叡人、譚競嫦、周永康、梁繼平

總編輯 張崑陽  
支持台灣獨立，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美術設計 Mido筑、馮詔天Sky  
來自在台灣人組織 - 香港邊城青年

校對 楊剛  
躲在你家的隱形實業負鼠

出版發行 社團法人經濟民主連合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28號9樓之一  
電話 (02) 2395-2552 傳真 (02) 2369-0318

客服信箱 flow.hk.cs@gmail.com (如水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 初版一刷

售價 新台幣 450 元 / 台灣  
新台幣 600 元 / 台灣以外地區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封面人物

背上自由之名：重逢北京奧運  
無感的翌日  
電話接通了NBA敢言球星  
Hines Freedom

作者 | 破曉



Source : Abhishek\_Chandra\_on\_Unsplash

## 背上自由之名：重逢北京奧運無感的翌日 電話接通了 NBA 敢言球星 Enes Freedom

作者 / 破曉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北京冬奧月初正式在杯葛風波之中揭幕，自己經過一輪內心掙扎還是收看了直播一會，並非有意捲進罷睇與否的爭議中，實情是很想比較一下與 2008 年夏天北京奧運開幕時的觀賞感受有多大落差。彷彿年代久遠，但筆者依稀記

得十四年前香港社會熱烈迎接京奧的盛況。當年某個下午老師煞有介事把課堂打斷，帶領同學觀看電視直播奧運聖火在香港傳遞。其時當紅藝人、政商名人、港隊成員紛紛接力傳送火炬，彌敦道沿途夾雜市民歡呼，甚至有人揮舞著五星紅旗高喊「中國加油」。如今，網民卻經常讓當年討論區用戶「我係中國人呀 Hi」的留言重見天日恥笑一番，並轉向同情當年高舉「雪山獅子旗」聲援西藏、曾是眾矢之的的港大學生陳巧文。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記錄顯示，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香港有超過一半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的中國人」，是政權移交以來唯一一次「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超越「香港人」。現時，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人數比例高踞七成。香港人究竟是在何時開始認同「香港人」身份？美國國家籃球聯賽 (NBA) 球星安尼斯·根達·自由 (Enes Kanter Freedom) 最近在國會山出席聲援人權活動時，







身後不但出現「雪山獅子旗」、還有「東突厥旗」和 2008 年尚未面世的「黑洋紫荊旗」。如果此情此景發生在 2008 年，恐怕不少當年的香港人也會一邊為奧運喝采，一邊對著聲援人權的人喝倒采。十四年以來，我們學到甚麼又改變幾多？《如水》找到 Enes Freedom 接受專訪，希望談談他如何背負自由之名。

「世界會對此感到震驚……」，Enes Freedom 最近在被母會塞爾特人 (Boston Celtics) 交易至侯斯頓火箭 (Houston Rockets) 後隨即被後者解僱 (waived)，其後他在 Twitter 留下了這則帖文。如果這是為人權發聲的後果，他的遭遇將給世界怎樣的啟示？在事件發生前數天，Enes 趁冬奧繼續就中國人權問題積極發聲，包括接受《如水》訪問。歷經土耳其政府打壓，在美國領悟到自由可貴的 Enes，近期在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後決定在名字最後加上 Freedom 一詞。選擇在美利堅背上自由之名，原因與這片土地為他帶來的改變有關。訪談中他回想起 2009 年甫抵埗美國就讀高校的那段時光開始。「當時我有位隊友批評總統，我擔心警察可能因而拘捕他，於是問他為何要這樣做。」他始料不及友人竟對此一笑置之說道：「兄弟不要擔心，這裡不是土耳其。」友人接觸向他解釋美國享有的言論和宗教自由等權利，使當時的 Enes 更加困惑，同時開始反思和學習人生過去未曾接觸的種種人權概念。隨著居住在美國的日子越長，他認知到自由可貴，於是希望讓自由一詞加到名字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同時藉此提醒下一代不要視自由為理所當然。

## 在籃球訓練營遇上突如其來的質問

其實，Enes 過往本來對自由的關注只局限於與自己切身的土耳其局勢，但一次遭遇卻意外地讓他覺醒到爭取自由應是無分國界。「有次我在紐約參加一個籃球訓練營，活動結束後我和其中一名小孩合照留念，然後她的父母在眾人前質問我，何解可以自稱是人權支持者卻只對土耳其的事發聲，而無視在中國集中營被折磨和強姦的穆斯林兄弟姊妹？」Enes 霎時間對問題所指的感到震驚，隨即向小孩父母承諾會有所回應，然後馬上決定取消當天餘下的所有行程，開始搜索有關中國的人權狀況。他表示隨後感到十分懊悔自己過去十年對此不發一言，自此決定對中國打壓人權暴行踴躍發聲。

過去的自身經歷，與 NBA 籃球員身份所獲得的關注度，令 Enes 深感自己

有責任向外界為自由發聲，同時無懼可能接踵而來對職業生涯造成的種種負面影響。他表示中國人權話題不應成為美國言論自由的禁區，「我感覺運動員因為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出現而擁有一個更大的平台發聲，並得到更多的青少年關注，我們因為需要以身作則而變得重要。同一時間，有很多運動員、演員、歌手、名人利用這些平台談論世上的不同議題，但當話題觸及中國時他們往往噤聲，所以我覺得需要挺身而出。」他強調自己無懼獨裁者威脅，只是就不公義的事發言，也希望身邊更多的運動員和朋友可以加入其行列，但相信他們都懼怕觸及紅線。

## 「冷清、閉環、濫調」的北京冬奧

冬奧在疫情陰霾下開幕前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承諾向世界呈現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不過，實際效果卻更似是一屆「冷清、閉環、濫調」的奧運會。西方多國分別以中國人權問題和疫情為由，事前相繼宣佈外交杯葛是次奧運。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日本、丹麥以至荷蘭等多國都宣佈不會派出外交官員出席在北京舉行的開幕儀式，印度國營電視台甚至拒絕轉播冬奧開幕及閉幕禮。儘管開幕禮和 08 北京奧運一樣由張藝謀擔任導演，亦不乏奪目的光影視覺效果和璀璨煙花匯演，但演出規模只有十四年前的五分之一。中國政府特意安排一名新疆維吾爾運動員迪妮格爾·衣拉木江 (Dinigeer Yilamjiang) 負責壓軸燃點聖火，做法惹來人權組織和外國媒體批評是政治挑釁，而這名似要協助北京當局粉碎新疆「種族滅絕」指控的女運動員在離開鳥巢主場館後亦未有機會回應傳媒提問，甚至據報在隨後的越野滑雪項目中首圈出局後便「銷聲匿跡」。

相信今天不少乍看北京冬奧的讀者們對利用體育盛事宣揚中華民族主義的做法不但沒有同感，更是麻木得無感。是的，很多人還是很支持參與冬奧的運動員們，譬如使小熊維尼多添一層可愛意義的羽生結弦。大家對中國在獎牌榜的收穫或許失去興趣，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把目光放在同屬美國長大的華裔運動員陳巍 (Nathan Chen) 和朱易身上，看看他們在溜冰場上分別代表美國和中國隊的各自遭遇，會否對自己的離散身份帶來丁點啟示。或者百感交集的心情尤如出爐德國雪橇金牌得主 Natalie Geisenberger 所講，一切要「等到離境後再對中國發表評論」。

外國觀眾眼中的今屆冬奧，也多了不少蔚為奇觀的畫面。例如中國實施「閉環管理」將參與冬奧人士與一般北京老百姓近乎隔絕，路透社記者就遇見一名穿著全套保護衣的酒店調酒師，於是把眼前景象拍下並上載至 Twitter，形容情景「極度反烏托邦」。同樣獲得如此形容的還有位於石景山的比賽場地「首鋼滑雪大跳台」，原因是滑雪道旁的煙囪形冷卻塔讓不少選手和網民誤以為是核廢墟。荷蘭電視台記者在北京直播報道期間被在場人員強行拖走則讓目睹畫面的主播和觀眾驚訝。芬蘭選手呂林佩雷（Katri Lylynperä）將選手村漏水的情況上傳至 Instagram，當局在處理事件前卻要求她先將相關影片刪除引發熱議。欲以科技掛帥向外界展示軟實力的中國亦大量採用機械人自動化送餐及消毒等程序，不過有加拿大記者就分享飯堂一個名為「智能漢堡檔口」的攤檔一直無法運作，而據報機械人製作出的漢堡味道亦欠佳……這些場內外的花絮雖則每屆奧運亦會間中出現，但在中方期望利用奧運對內對外宣傳執政成就的時候卻更顯突兀和諷刺。中國官方宣傳北京是世界上首座「雙奧之城」，代表北京是全球目前唯一同時舉辦過夏季和冬季奧運會的城市，兩屆相隔不久的奧運會反映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轉變，2008 年中國以萬邦來朝的姿態向世人展示中華文化和民族主義抬頭的形像，在國際形勢舉步維艱的今日已大不如前。

## 「消失的彭帥」與「幼稚的姚明」

對於冬奧在北京揭幕，Enes 表示對國際奧委會選擇支持中國繼續主辦今屆奧運而無視新疆集中營和香港大搜捕的決定感到羞恥和失望，但同時樂見各方願意繼續就此積極發聲。冬奧亦成為國際關注中國女子網球手彭帥狀況的時機。去年她指控中共領導人性侵後曾經下落不明，導致國際女子網球協會 (WTA) 連番發表聲明，甚至暫停原定在中國和香港舉行的所有賽事。網民更發起「彭帥在哪裡」(#WhereisPengShuai) 標籤。身處中國境內的彭帥隨後透過網絡、文字、現身活動等各種方式嘗試打破傳聞，但始終無法排除正接受中國政府監控的疑慮。最近彭帥在北京接受一次由中國奧委會安排的外媒訪問時，身旁的鏡中倒影顯示有一名男子似乎在場監視著她的舉動，再使事件添上陰影。冬奧開幕之際，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 (Thomas Bach) 與彭帥在北京奧林匹克俱樂部會面，會方的聲明隻字不提性侵犯指控，中國官方有多大程度參與是次會面亦實屬未知，但客觀而言國際奧委會的聲明則加持了中國官方的一貫說法。Enes 指出國際奧委會正是「更大問題的



Source :Feng\_Shan\_on\_Unsplash

一部分」，直指他深信是次會面只是官方宣傳的伎倆，強調除非彭帥能夠從中國出境，否則都不會相信她正享有言論自由。

彭帥是否仍有出入境自由成疑，不過 Enes 卻毫不介意反過來到中國走一趟。上月 NBA 中國知名球星姚明在公開活動稱希望邀請他到中國，Enes 馬上回應希望有機會到訪新疆、西藏、香港、甚至台灣，看看當地民主是怎樣。豈料姚明不但沒有回覆，反而在社交媒體把他封鎖。他在訪問中再次談及此事時形容姚明做法幼稚和可笑，又再次引用自己早前在電視訪談中的回應，形容姚明「雖擁有龐大身軀，卻是心胸狹窄和頭腦簡單」(Big body, small heart, tiny brain)。他表示遺憾看到 NBA 其中一個最佳球員為成為中國政府的傀儡和喉舌而押上自己聲譽，呼籲對方停止出賣靈魂，對中國人權狀況應抱懷疑態度。

## 利用體育商業化打壓人權

兩年前，時任火箭總經理莫雷 (Daryl Morey) 曾經在香港反送中時期政府通過《緊急法》後於 Twitter 發佈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口號“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其後惹來中國網民強烈反彈，從官方組織到轉播商和贊助商都中止與火箭的合作，最終莫雷澄清發文純屬個人表態嘗試為事件降溫，但中央電視台仍然禁播了一整季的 NBA 賽事。同樣的情況一樣發生在一向敢言的 Enes Freedom 身上，他針對西藏人權問題的發言令中國當局決定禁播塞爾特人的比賽。此次轉會風波是否與近年 NBA 賽會與球隊備受中國輿論壓力勢必惹人遐想。此前，金州勇士 (Golden State) 班主查馬斯·帕里亞畢提亞 (Chamath Palihapitiya) 在 Podcast 訪問中直言根本「沒人在乎」維吾爾人在中國的遭遇。Enes Freedom 在訪問中回應此事時表示相信前者的發言亦反映部分 NBA 球隊老闆的態度，他們在面對大量金錢引誘時變得懼怕發聲，自己對相關言論感到失望和嘔心。事實上，NBA 不但是世上頂級水準的籃球聯賽，更是體育商業化的經典例子。據美國 CNBC 報道，NBA 目前在中國市場價值達 50 億美元，單是與騰訊的轉播權合約便高達 15 億美元。體育頻道 ESPN 估計莫雷的 Twitter 推文風波讓 NBA 損失兩億美元的營收。據統計，疫情前 NBA 在中國每年營收已達到 12 億美元，佔總收入一成，而在中國觀看 NBA 的人次更多達 8 億人，是美國人口的 2.5 倍。這些數字還未將週邊產品包括波鞋和波衫授權





等利潤計算在內。Nike 最近公佈公司季度業績，在去年第二季營利達 114 億美元，大中華地區營利達 18 億美元。換言之，粗略估算中國市場佔 NBA 或體育用品銷售整體的商業價值約一成左右，在商言商仍然極具吸引力。面對來自中國國內的政治壓力，採取淡化甚至噤聲的策略應對看似不無道理。在加盟火箭告吹之前，Enes Freedom 在 Twitter 發佈一段「衰仔樂園」(South Park) 畫風的諷刺動畫，影片的主角正是習近平和 NBA 傳奇球星勒邦占士 (LeBron James)，不能排除火箭是為免承受壓力而拒絕讓他加盟。那麼，中國是否已經看準美國體育高度商業化的死穴來打壓球場內的異見聲音？

## “Just Do It ”

在 NBA 的賽場上，Enes 始終沒有放棄每一刻可以發聲的機會，往往穿着特製的球鞋上陣，鞋上寫有聲援香港、新疆、西藏和台灣等地爭取民主自由的口號。不過換來的，是工作人員連番要求他脫下球鞋和 NBA 方面的多次施壓。去年，Nike 與多個運動和服裝品牌因為曾表明不會採用涉及強迫勞動的新疆棉花而被不滿的中國民眾發起罷買抵制，面對市場壓力不少品牌選擇讓步。在 Enes 眼中，這些品牌讓人耳熟能詳的口號和價值行銷儼如空話。他希望以誠意打動那些仍然與 Nike 有合約在身的球星如勒邦占士，讓他們改變主意。「我會跟他（勒邦占士）說，你正在美國賺取以百萬計的金錢但你正穿着的這件衫和簽下的合約，卻是來自一間世上最大型的偽君子公司。」讓 Enes 更感不滿的是 Nike 狹持雙重標準向獨裁政權下跪，「它宣稱與黑命貴 (Black Lives Matter) 和反歧視亞裔等運動同在，但當知道可能得罪中國而損失數以十億計的收入時便收聲。」

不過與此同時，聲援自由的人卻不一定在這場與獨裁政權對陣的比賽中處於下風。離散香港人依然在海外持續呼籲抵制那些選擇屈服的品類、香港與台灣仍佔這些品類分區的一部分可觀銷售額，而中國以外的海外市場依然是整體商業利潤的絕大多數來源。例如港台兩地是計入 Nike 的大中華地區業績，而 NBA 最近積極開拓的非洲市場，則是中國以外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另一方面，香港人在整肅風氣蔓延的持續政治打壓下，亦有默契地堅持運用自身購買力作另一種政治表態。《立場新聞》在被搜查前刊登的一篇專題報道發現，歌手陳奕迅在新疆棉風波期間中止與 Adidas 的代言合約後，在香

港 Spotify 的播放率即時顯著下降。在市面上「黃色經濟圈」雖然宣稱力度難以媲美 2019 年，但今年初另一項調查發現，屬於「黃色經濟圈」的 Mee 應用程式每月活躍用戶人數意外地力壓其參考對象，被視為「藍色經濟圈」代表、牛奶公司集團旗下的 Yuu 獎賞計劃。親政府媒體《東周刊》更在報道承認，以 Mee 公佈每月達 780 萬使用人次作計算，假設每次用膳消費 50 元，每月黃店整體生意額已至少有接近四億港元。港府對此似乎束手無策，當消費者運用個人自由選擇光顧符合自身價值觀的商家，貿然打壓則可能賠上本港經濟自由度和聲譽而陷入兩難。中國官方利用民族主義狂熱乘機扶持國內品牌如安踏和李寧之際、疊加疫情後的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亦可能令失去市佔的外國品牌加快撤離其位於中國的生產線，對需要外資的中國帶來一定壓力。在籃球比賽中，投籃命中失敗有時可以透過搶籃板的戰術反敗為勝。香港沉寂一時的「黃色經濟圈」討論，會否以反送中時期曾被提出的全球版「黃色經濟圈」概念，未來在體育商業化的自由世界捲土重來，於下一節與極權對壘的比賽仍然值得拭目以待。

## 需要與時並進的奧林匹克精神

正當中國運用自由世界的體育商業化漏洞在全球擴張影響力，在國內卻經常以避免體育政治化為由試圖阻擋西方軟實力包括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進入中國。面對國際社會外交杯葛冬奧，北京批評是「政治操弄」，中國外交部指做法有違《奧林匹克憲章》中的「體育運動政治中立」原則。不過，即使撇開兩屆北京奧運的爭議不談，回顧奧運會的歷史與政治亦總有著密切關係。相傳在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希臘各城邦都會放下干戈於賽事期間休戰片刻。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政治化例子亦多不勝數，包括當中的表表者 1936 年柏林奧運，當年納粹德國期望透過主辦是屆奧運高舉日耳曼民族主義和突顯雅利安人種優勢，甚至安排了執導納粹宣傳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 的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 (Leni Riefenstahl) 以當時而言劃時代的電影美學拍攝紀錄片《奧林匹亞》(Olympia)。1980 年莫斯科奧運被全球超過 50 個國家抵制這屆唯一一次由蘇聯主辦的奧運會，多國不單參與外交杯葛，更是連運動員代表團都拒絕派出。最諷刺的是，中國七十年代透過「乒乓外交」使中美關係破冰本身就是「體育政治化」的範例。根據政治科學家 Thomas R. Dye 定義，公共政策包含政府選擇做或不做的事，按同樣邏輯政治中立亦不同非政治化。遺憾的是，反對「體育政

治化」的論述在中國被引伸成打壓言論自由和人權運動的藉口。事實上，中國政府動輒搬出反對政治化的講法，實際效果是除了執政者以外沒有人有資格參與政治，在剝奪大部分人討論政治的人權的同時進一步鞏固和合理化寡頭政治的存在。近年，從美式足球員到英超球員單膝下跪反對種族主義等事件，皆反映運動員參與民權運動 (Athlete activism) 的情況越趨普遍，促使國際奧委會在東京奧運舉行前夕修改《奧林匹克憲章》第 50 條，首次明確容許運動員在比賽及頒獎以外的場合合作政治表態，顯示國際奧委會有必要改變既有做法以追上時代步伐。

國際奧委會最近的讓步正好是時機重新探索奧林匹克精神以至體育本身的價值。Enes 在訪問中清楚表明，自己一直以來並非討論政治立場，而是討論人權。國際奧委會的《運動員權利和責任宣言》指出文件靈感源自《世界人權宣言》，而《奧林匹克憲章》亦列明運動是天賦人權，且憲章所保障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都不應因種族、膚色、性別、性傾向、語言、政治、宗教等理由而遭歧視。中國政府在主辦冬奧的同時，將成千上萬的維吾爾人關押在集中營、持續打壓香港和西藏等地的自由、乃至疑似軟禁運動員，才是真正踐踏奧林匹克精神和人權的一方。1964 年東京奧運，國際奧委會決定禁止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代表團參加當屆奧運，後者隨後缺席了足足七屆奧運才重返賽場。1968 年墨西哥城奧運中，非裔美國運動員史密斯 (Tommie Smith) 和卡洛斯 (John Carlos) 在 200 米短跑項目中分別得金、銅牌，兩者其後在頒獎台上高舉戴着黑手套的拳頭，成為奧運場上對人權表態的標記。2000 年悉尼奧運，澳洲原住民運動員弗里曼 (Cathy Freeman) 在奪得女子 400 米短跑金牌後身披澳洲土著旗 (Aboriginal flag) 繞場一週。2012 年倫敦奧運，國際奧委會促使沙特阿拉伯奧委會容許女性參與該屆奧運。上述不少例子嚴格來說甚至違反了奧林匹克憲章規定，但這些捍衛人權的光輝



Source :Sanzhar\_Alimkhanov\_on\_Unsplash



時刻卻定義了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和體育價值所在。

## “Don’t just talk about it, be about it”

當北京冬奧閉幕，代表中國國家機器的標誌在溜冰場上的道道痕跡中黯然褪色，但地球另一端的 NBA 籃球場上依然將會因為不同聲音堅持發聲而繼續五光十色。Enes Freedom 作為其中一位最踴躍為人權發聲的現役 NBA 球員，他十分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其運動員身份，更是作為一個人的責任所在。談論到未來去向，他表示會讓世界察覺中國的獨裁統治，自己亦無懼再向前踏出一步，又提到有份推動剛在美國國會通過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和正在審議階段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以及自己與台灣總統蔡英文的互動。他表示全力支持曾自己見過面的維吾爾和香港民運人士，形容需要更多實際行動，“Don’t just talk about it, be about it”。

最近社交媒體流行分享五年前的自己，Enes 在訪問尾聲亦回想起自己五年前到訪香港之行的經歷，包括參觀學校即場與學生交流球技以及會見本地的土耳其裔族群。五年間，香港社會經歷劇變，但他和同行的香港人一樣對自由的堅持有增無減。儘管在 NBA 發聲有時會感到孤獨，但背後持續推動他的正是相似的遭遇和共同的情感。他表示能夠克服恐懼是因為想起正身處土耳其、自 2015 年便無法見面的家人。「每當我坐下跟逃離獨裁的生還者和民運人士見面時，我腦海中便浮現自己的母親和妹妹，想著假如自己已婚，妻女每日在集中營中被折磨，或是身處香港與台灣目睹國家被奪去，自己是否仍然會選擇沉默，而答案是否定。」他形容人權打壓並非只出現在土耳其，而是世界各地都正在面對的問題，而自己希望為無法發聲和無辜的一群繼續發聲。背上自由之名，對仍在堅持和經歷離散港人而言，Enes Freedom 為人權而吶喊使我們不感孤單，深信對他來說亦是同樣，在體壇和球場上發聲的運動員，他不是第一位，也將不會是最後一位。因為在 Enes 球衣背面形影不離的，是自由。



海外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 5 Reflections on Hong K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作者 | Luke de Pulford

## 5 reflections on HK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Author / Luke de Pulford

Political organiser and coalition builder. Junius Ho's BFF.

I had to think pretty hard about whether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 to write this piece. I mean, I'm not from Hong Kong. I haven't had to give up my home, or disown my family. I haven't had to suffer the trauma of trying to latch onto half-baked "lifeboat" schemes in order to live some semblance of a normal life. There's a huge experiential gap between us. So I really can't write about "the diaspora" (whatever that means) with any authority. So, big upfront disclaimer: I make no claim to expertise about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One of the reasons it's so important to say this is that there is - for a whole series of complex socio-cultural reasons - a constant struggle for agency within the Hong Kong liberation movement. This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presence of a number of foreigners like me, who are embedded in far-off legislatures, and who have had qualified success in using our political leverage to help with your cause. We enjoy a disproportionate platform in your movement. For some of us, this is discomfiting, and for others it is seductive. Whatever the reasons and corollaries, it is unquestionably true that there is a skew in representation. I'll talk about this more a little later, but mention it here to underline that these thoughts are offered from an outsider's perspective. They might be useful to somebody. If they're not, then they might make good kindling for the fire.

So, heavy caveats out of the way, permit me a brief explanation of why I have taken an interest in your city. I've worked on human rights related issues in China since about 2009, and pretty closely with some of the key pro-Hong Kong voices in the UK since about

that time. But my core motivation for taking things up more dedicatedly in 2019 was ideological. It has been clear to many of us for some years that China's rise presents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rules-based and human rights systems. It has been equally clear that Hong Kong is - or more accurately, was - the fault-line between the existing system: one which broadly reflects the overarching value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order, and one which reflects a different set of values which the PRC under Xi Jinping would seek to impose. That's why I came to the issue more dedicatedly in 2019 - the threat seemed imminent and the need for a response urgent.

Things have changed, though. While the ideological commitments remain, they have gradually given way to a deeper motivation - one rooted in friendship, and an affinity for place and people. It's a conviction which has deepened since the pass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ich has stolen a number of friends, incarcerated them, and mercilessly crushed their futures. This has led me to follow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ever more closely, and to attempt to find ways of pushing forward political initiatives, as well as attempting to help some Hongkongers who have ended up in the UK. So there you have it: a brief apologia for banging on about a city I barely know, but one that nevertheless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life.

Being at the heart of relevant political ventures in the UK offers a certain perspective. Precisely because the Hong Kong struggle is not a personal cause, I suppose it's easier to frame the issu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ny other geopolitical issues vying for parliamentary attention. MPs are constantly lobbied to take up various causes. Afghanistan, Xinjiang, Ukraine, Tigray, Myanmar. The list goes on. Some Beijing-friendly politicians in the UK bemoan that too much attention is given to Hong Kong and that the political energy put into focusing on the city's demise is totally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severity of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I think this point of view



is short-sighted, but the argument has some force. It doesn't take a huge leap of empathy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might look at massacres in, say, Tigray or Northern Nigeria, and argue that, however bad things are in Hong Kong, they haven't reached the level of atrocity.

Following this line of though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has been outstandingly successful - enjoying a high level of political attention despite various catastrophe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competing for the spotlight. At risk of sounding a bit brutal, though, this isn't entirely - or even mainly - due to the efficacy of the political movement. I think it owes at least as much to the global dispersion of Hongkongers among various elites. It has been quite moving to observe Hongkongers abroad using their hard-won influence to turn the attention of their colleagues and wider public towards their home.

The truth is that, even with raised awareness, the movement (in my view) isn't reaching its potential.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Here are a few, as I see them (with apologies for listing):

First: **we don't know what you want.** This criticism is a bit flip-pant and unfair, so bear with me. Foreign legislators really don't know much about developments in Hong Kong. With very few exceptions, if they sound even halfway knowledgeable, it's because someone else wrote their speech. Broadly speaking, they know that Hongkongers are not happy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but they are much less clear of what the "movement" would like to be done about it. I put movement in heavy inverted commas here because it's a pretty nebulous concept and not terribly useful for addressing this particular problem. The "movement" has no entry criteria, there's no central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no mandate. So appealing to the "movement" to solve issues around the clarity of your demands cannot succeed, except through consensus-based

reception, which has its own issues. As with any democratic polity, it's unreasonable to expect some kind of homogeneity of opinion within the Hong Kong diaspora. Yet clarity is needed to orientate the advocacy of foreign politicians. This presents something of a paradox to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see self-determination in Hong Kong: how do you respect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diversity within the diaspora while making the most of the limited political energy available to your cause? To my mind, there ought to be an effort to arrive at some consensus-based demands, rooted in holding China accountable, but that's for others to say.

Second: **division is normal**. But it's your enemy. I have never worked on a campaign that has been free from division. People don't agree on strategy, they have institutions to protect, and get territorial. Some people like holding the microphone a bit too much, some get jealous, etc etc. Disappointing, yes, but when you throw high emotions, trauma, and inexperience into the mix, it's unavoidable. Going where angels might fear to tread, I see quite a lot of it in the Hong Kong movement. Overclaiming, protagonism, counter-briefing, gossip,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goes along with it.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doing this sort of thing seek to justify their actions with a superficially noble goal. Take it from me, if you hear negative briefing about someone else in any movement, it is very rarely motivated by concern for the cause, and nearly always motivated by something else - usually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doing it. The reason it is worth raising here is because this kind of thing does nothing to push the cause forward. It undermines unity, confuses politicians, and divides your base. You can always tell a seasoned campaigner by their effort to affirm where they can and refuse to engage in this sort of thing. Truman apparently said, "it's amazing what you can accomplish if you don't care who gets the credit". I think there are important lessons here for every campaign, especially diasporic ones.

Third: **representation is a continuing issue.** Simply put, movements need figureheads. As I wrote in a (now deleted) Apple Daily piece about two years ago, the vernacular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 is modeled on diplomacy. Without a mandate and figurehead it's really very difficult to make headway. The movement has tried to solve this in various ways, and has some exceptionally talented protagonists: Nathan, Chung Ching, Joey, Ray, and many others. But there's still a conceptual gap between activists and mandated representatives. I don't have a solution for this. And it certainly won't be solved by a parliament in exile, which seems to me a self-defeating proposition purely because it will never enjoy the necessary level of legitimacy. Some creative person or institution could attemp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by attempting to develop consensus around some new demands. A consensus-building exercise here would help to offer a kind of issues-based legitimacy, but, again, that's for someone else.

Fourth: **cultural differentialism and white bias in the media as a barrier to entry.** Extending the agency point I referred to earlier: it'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to platform Hongkongers. Behind the scenes, a lot of work goes on to direct journalists, politicians and others towards Hongkonger advocates. A couple of things I've noticed: first, the media generally lacks the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if a Hong Kong voice will turn out to be a liability for them (their primary concern is avoiding embarrassment) so they tend to come to people like me first. Second, the mechanics of media production almost requires a triangulation point. "You're my China guy" is something I get a lot. Ridiculous, isn't it? It's almost as if there is a latent fear of going direct to Hongkongers - as if only people vouched for by a white usher can be relied upon. As much as those in the media like to burnish their credentials around fairness, representation, and agency, the truth behind the scenes looks very different to me.

More importantly though, I've noticed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reticence, or unwillingness, among the Hong Kong diaspora to ask for help. Demanding help from foreign governments or institutions seems to be something which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This has been especially pronounced with the BN(O) scheme. Some within the community seem to believe that access to the scheme will be withdrawn if the community is seen to be causing trouble (an emphatically false proposition). It's like the diaspora feels that it is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 in someone else's land where the guillotine might descend at any moment. I've called the phenomenon of not wanting to ask for help "cultural differentialism" in the title of this section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 trait itself might owe something to Hong Kong being a former colony. I know I'm on risky ground here, but I have been consistently frustrated by the unwillingness of the movement to demand the fulfillment of what was promised by the UK and others. I may be misreading this, but it's almost as if Hongkongers don't believe they deserve help - as if there's an ingrained predisposition to accept what is given, and not to ask for more.

This is frustrating because the UK made promises to Hong Kong, too, and we haven't fulfilled them. If I were you, this would enrage me, but raging at the betrayal of the UK does not seem to be an option for Hongkongers, diaspora or not. It angers me that the UK has also embraced this dynamic, adopting a very reminiscent paternalistic mindset towards you, which assumes that throwing you a bone through the BN(O) scheme will mean that you won't be angry about our failure to keep our treaty promises, which were too weak anyway (also the UK's fault). I've also noticed that generally Hongkongers are much more tolerant of my bullshit than others. It is fair to call this "differentialism"? Maybe not,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general phenomenon which is holding you back, allowing others to hog your platforms, and letting world governments off the hook.





**Fifth: transforma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Most of the thoughts above are relevant to a traditional style diaspora movement, so the whole analysis may be misplaced or at least out of date. I've noticed that, as the campaign has inevitably lost energy, attention has turned towards simply getting on with your lives. What's interesting here, though, is that this doesn't seem to be an individualistic turn, or a way of forgetting the struggle for Hong Kong. Rather some are seeing integration as a tool for liberation. The UK in 2022 has more Hongkonger teachers, engineers, doctors, nurses than ever before.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the UK is likely to overtake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erms of numbers. This presents a real opportunity to craft a diaspora identity which is rooted in your way of life, but so embedded in the institutions and life of this country that it will eventually tilt the UK as a whole towards the preservation and eventual liberation of your city. And yes, this means that Hongkongers need to jo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K and get elected. As citizens of another country, representation is a right to which you are entitled. Nothing would signal more clearly that you have taken rightful ownership of your adopted citizenship, however temporarily it might be held.

A final note: please have patience with us over the coming years. We don't know enough about your way of life, we don't grasp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under which you have lived, and few of us can empathize with the sacrifices you have had to make. There may be some rocky moments over the coming years as both you and the societies in which you have settled come to terms with this huge upheaval. Mistakes will be made, but, we will emerge from it stronger together, and eventually, Hong Kong will be freed.



海外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 Immunity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 Estonian Case





作者 | Iverson Ng

# Immunity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 Estonian case

Author / Iverson Ng

Columnist of the oldest Estonian newspaper Postimees. Holding a Master's degree in EU-Russia Studies in Estonia's national university Tartu Ülikool

The year of 2022 is a decisive year for gathering Hong Kong diasporas together. It is not only about the diasporas in the Anglosphere (the UK,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ut also those living in European countries. As a Hongkonger living in Estonia, a Baltic-Nordic country consisting of only 1.3 million inhabitants, finding other Hongkongers living in the rest of other 26 EU member states has been a challenging task because Estonians are the minorities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Almost five years ago, I moved to Estonia to pursue a Master's degree in EU-Russia studies in Tartu University, Estonia's national university founded by the Swedish King Gustav II Adolf in 1632. Back then, my goals were crystal clear: getting myself fully integrated with Estonian society, mastering Estonian and Russian languages, as well as paving the way to become a civil servant in the EU institutions.

My goals have changed since the 2019 Hong Kong crisis. As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in recent years, I have come to realisation that we all need to build a stronger Hong Kong diaspora community in Europe. We need to maintain Hong Kong's democratic memories and resilience against intimidations from Chinese nationalists living in Europe and all forms of Chinese attempts to silence Hongkongers living in Europe. I have been fortunate enough to be nurtured by a Baltic country like Estonia to build resilience to defend my cultural roots by learning from the Estonians.

## **Mu isamaa, mu õnn ja rõõm (My Fatherland, My Happiness and Joy)**

The Estonian language constitutes a crucial part in maintaining Estonians' national feelings from the Russian imperial rules to the illegal Soviet occupation. For Hongkongers, the question of mother tongue has always been an existential question; for Estonians, their language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Estonian identity and their former conquerors.

Estonians' patriotism is beyond a reference for Hongkongers from home to abroad to defend themselves from being assimilated into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Emakeelepäev (Mother Tongue Day in Estonian), is a day not only to commemorate the Estonian language, but also to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Estonian poet Kristjan Jaak Peterson. In the early 1800s, when lectures in Estonia's national university Tartu University were only given in German, Peterson was the first student who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al awakening of Estonia for their mother language.

In Hong Kong, while Cantonese is still allowed to be spoken, it is important for Hongkongers to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antonese to project Hong Kong's values without engaging in any direct political debates to risk getting arrested or jailed. For example, LIHKG, Hongkongers' Reddit, is a commonplace for Hong Kongese slangs to be used and shared. As Hong Kong's education system is getting more 'mainlandized', it is every Hongkonger's duty to defend our mother tongu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space.

Owing to Estonia's tragic history, the content of its national anthem comprises explicit references of Estonia as the land of Estonians which they hold dear. Estonians are thankful for their fatherland because Estonia was independent from Russia briefly



during 1918-1940, and restored independence from Soviet occupation in August 1991.

On the other hand, as Hong Kong's unofficial anthem 'Glory to Hong Kong' (願榮光歸香港) has been bann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ince June 2020, Hongkongers struggle to find a song to unite 7.4 million residents in the territory. However, while the song itself was banned, Hongkongers could refer to the protest anthem through other indirect ways in Cantonese.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remind Hongkongers that just because Hong Kong civil groups have gone underground, our resistance against tyranny will not end.

## Laulupidu (Singing Festival)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Estonia is a singing nation. While there are similar traditions in Latvia and Lithuania as part of the common Baltic identity, I shall not elaborate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inging Festivals among the Baltic States. For Estonia, the Singing Festival was first held in 1869 as part of the Estonia national awakening movement. Featuring a list of Estonian songs with patriotic sentiments, this is a tradition which Estonians managed to keep passing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from the Russian imperial period to the Soviet Occupation. With over a century of tradition in organising singing festivals, Estonians took advantage of cultural activities in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demands. In 1988, Estonian artists and singers united Estonians by organising concerts in Tallinn's Singing Ground to express their desire fo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The movement lasted for four years before Estonia restored independence in 1991.

For Hong Kong, Hongkongers appeared to be tired of this way of peaceful gathering while holding music concerts to express their

demands, largely due to the failure in the 2014 Umbrella Movement. However, Hong Kong's civil spa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limited to an extent in which almost all forms of protests are banned either due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the current COVID-19 restrictions. Hongkongers need to find a way to revive the local music industry to build cultural capitals for rooms to express our political demands, just like what Estonians did to sing the banned Estonian national anthem with the Estonian blue-black-white tricolour flag at the end of the singing festival in 1988.

Although Estonia has regained freedoms for over three decades, the tradition of organising singing festivals remains for every five years. To engage more young participants, Estonia also holds a mini-version of singing festival to pass on such tradition. As a country of roughly more than a million Estonian speakers, Estonia's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key to ensure Estonian civil society functions well.

## **Ärgake Baltimaad (Wake up, Baltic States)**

Estonia's centuries-long struggle for its freedom and identity has always been a big part of its fellow countrymen and women'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Northern Crusades in 13th century to the Russian imperial rules in 18th century before Soviet and Nazi German occupations, Estonians were ruled by the Danes, the Swedes and rulers of the then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 While Latvia shares most of the history of Estonia as some parts of Estonia and Latvia used to be part of Livonia in the 16th-17th centuries, Lithuania was once the largest European state in the 16th century before the rise of Muscovy, the predecessor of the Russian Empire.

Notwith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ry, what united the Baltic States was the Russian imperial rule and the subsequent Soviet occup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 1989, to commemo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olotov-Ribbentrop Pact, a secret deal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which led to illegal Soviet occup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two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Baltic States formed a human chain to express their demands for freedoms and disapproval against the occupying power. Two years after the Baltic Way, in 1991, all three Baltic countries restored their independence after being occupied by the Soviet regime for over half of a century.

To extend the Baltic legacy to Hong Kong, 30 years after the Baltic Way, a Tallinn-based Hong Kong entrepreneur proposed a similar Hong Kong Way on LIHKG. Within a month of preparation, 210,000 Hongkongers formed a human chain across the Kowloon Peninsula,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Hong Kong Island, expressing their demands for a just, free and democratic Hong Kong.

Last year, to honour this courageous Hongkonger who propose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onymousl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lobal advocacy group Stand With Hong Kong, I decided to initiate a series of photo exhibitions in Tallinn, Riga and Vilnius on the 2019 Hong Kong Way to connect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the 1989 Baltic Way. Hosted by the Estonia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Memories in Tallinn and the Lithuanian Museum of Occupation and Freedom Fights in Vilnius, the photo exhibitions were largely successful as both exhibitions received news coverage from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broadcasters. While the Latvian Occupation Museum decided not to host the exhibition at the last minute for unknown reasons, the 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Latvia on the Hong Kong Way itself was good enough to call it a success to inform Latvian audiences about what happened in Hong Kong in 2019.

But the Hong Kong Way initiative was far from a one-off event. Fol-

lowing the exhibition in Tallinn, an Estonia-based Belarusian exhibition curator invited me to co-curate a photo exhibition of Hong Kong's Mo Lei Tau (nonsensical in Cantonese) humour; a US-based Latvian professor decided to invite me to curate a Hong Kong Way photo exhibition in a US university after knowing that the Latvian exhibition was cancelled in Riga. To Hongkongers, the Hong Kong Way event might be just another tactic to dra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peoples of the Baltic States, however, the Hong Kong Way symbolises their spirit of fighting for freedom during the Soviet occupation.

## The European dream started with a few

Unl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European Union consists of 27 countries with contradictory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while the Baltic States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communist governance, Western European and Scandinavian countries often choose to comprise their democratic values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n my case, Estonia i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onnect European Hong Kong diasporas as it has been leading the rest of the Baltic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not only does Estonia connect to Denmark and Sweden due to the Scandinavian crusaders, but it also ties with Finland for their linguistic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More importantly, Estonians fully understand how peoples from Visegrad countries (Czechia, Slovakia, Hungary and Poland) struggled for decade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s before they finally joined the EU as a bloc of European countries upholding human rights, democratic values and basic freedoms (though Hungary and Poland are taking an authoritarian turn).

From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Europe-based Hongkongers could establish deeper connections with its local audience through his-

tory. Apart from the Hong Kong Way, there are many other events, installations and figures which connect Hong Kong and Europe, such as John Lennon Wall in Czechia, Berlin Wall in Germany, ‘Free Hong Kong Street’ in Hungary, Hong Kong-raised Danish ex-princess Alexandra Manley, ‘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painting in France and so on. Europe has so much potential for Hongkongers to speak with one voice against the totalitarian regime of Hong Kong.

## From EU-27 to a Hong Kongese ‘Troika’

Every crisis comes with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hanges. In 2021, the crisis of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emerged as over 50 Hong Kong civil groups dismantled. Hong Kongese diaspora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come more vocal on Hong Kong affairs as more Hongkongers are moving abroad and those well-integrated Hong Kongese diasporas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stand up for the silenced Hong Kong civil society. Yet, there is no well-established mechanism for Hongkongers around the world to better coordinate their initiatives and utilise their strengths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ir regional groupings and geopolitical backgrounds.

In Europ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Hongkongers have been strengthened to synchronise the efforts made by Hong Kongese diasporas living in different European countries. To create more synergies with other Hong Kong projects in different continents, a troika-styled coordination system could effectively divide Hongkongers into three main streams of task forces: establishment of Hong Kong-relate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ties in Europe, policy-oriented civic initiatives in North America, and facilitation of Hong Kong-friendly businesses in Japan and ASEAN countries.



The geo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re based on the strengths of Hongkongers living in the aforementioned continents—the European Union does not have a unified foreign policy, but its diversity of culture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ojecting Europe as a global soft power; the US remains a significant global power which shapes Hong Kong'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t still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UN, G7 and G20 as well as NATO, the WTO, and the Five Eyes alliance; while ASEAN is the fif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Japan ha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interest on Hong Kong with a sizeable number of Hongkongers living there.

Eventually, a global collective pushback driven by the Hong Kong diasporas against the Chinese-controlled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needed to change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Hong Kong.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Hong Kongese alliance, a transatlantic civic alliance among Hong Kong diasporas must be a priority. At this stage, Hong Kongese activists, diaspora groups, artists and other influencers are working on their own agenda separately. It is high time we created a communication channel for Hong Kong diaspora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to better coordinate our latest local initiatives.

# 海外創業與香港人商會

海外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作者 | 千八女鬼

# 海外創業與香港人商會

作者 / 千八女鬼

留美博士學生，香港流行文化粉絲

在美國某大城市的一間四川菜館，兩位年輕女士拉著小小的流動貨車。她們向川菜館暫借了水吧一角，向顧客推銷她們剛研發的雞尾酒。雖然川菜館座落在市中心，顧客主要服務美國人——白人、華人、黑人等不同種族的美國人——，她們希望知道顧客喜歡什麼口味的雞尾酒。首次創業的兩人，經過兩年搜集資料、消化沉澱，她們在大學城開設了第一間店。兩人經營有道，翌年即在市中心開設了首間分店。再相隔一年，在 2020 年，即使美國正經歷猖獗的肺炎疫情，她們仍成功在唐人街插足，開設了第二間分店。最近她們密謀更進一步發展品牌的特許經營權。

這兩位商人，均是不到三十歲的女性，其中之一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港女」阿梓。阿梓最近參與剛起爐灶的海外香港商會，該網絡由香港社會賢達領軍，聚集一眾志同道合在海外經營大大小小生意的香港商人。阿梓向《如水》分享她參與海外香港人商會的緣由和在美國創業、經商的心路歷程，希望她的經驗可以讓其他有志在海外創業的香港人參考。

## 參與海外香港人商會的緣由

出身香港的阿梓已和家人在美國定居十數年，她在美國的雞尾酒生意主要服務美國人，平日生意實際操作甚少與香港沾上邊，生意亦已漸上軌道，理應不愁出路。而該剛起爐灶的海外香港商會，由公開批評香港政府、支持民主人權的社會領袖設立。在今天的社會，作為商人的阿梓與他們掛勾，或很容易會被扣上反中亂港的帽子、引來海外小粉紅追擊，為什麼她依然冒風險參與商會呢？

事緣是，阿梓是某海外香港專業人士網絡的成員，她在群組內認識了正在籌劃海外香港商會的人士。該人與她傾談過幾次，解釋了創立商會的因由：在新一波的香港移民潮，大批香港人移民英國，當中有不少人希望在海外創業。幾位知名的香港的商人、學者、專業人士藉著這一波移民潮，在海外一暫時主要為英美一招攬志同道合的香港商人，建立海外香港商會。現階段商會

的服務包括建立香港商業名冊、為創業者提供工作坊、舉辦活動讓商家拓展人際網絡、為公司籌集資金等等。阿梓答應加入商會，當中她考慮的不只是在商言商，而是希望透過商會凝聚相同理念的商家：

「我覺得參與商會是我應該要做的，如果我這次不做，我之後會後悔。因為籌辦這事（海外香港人商會）沒有太多人做過。中國在國外有很多商會，許多商會甚至有中國領事館支持。在香港和海外有很多香港商人為了要『埋堆』而要染藍。我們要在海外建立一個香港人商會，避免商人參加中國商會。」

在 2019 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香港及海外大小的人權、政制關注組織相繼成立，包括學生組織、地區組織、專業人士組織。在 2020 年香港實施《國安法》後，香港正式進入威權管治時代，政權收緊香港在法律、媒體各方面的自由，對於香港社會全方面實行政治制約，例如親民主媒體《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皆已停止運作、香港支聯會亦在強權逼迫下解散。在這時刻，海外的香港人組織對凝聚在外香港人、在海外建立公民社會尤其重要。香港境內現時不少「黃店」林立，希望可以打破對中國產品的依賴、及杯葛親政府、反民主的商店；這些黃店逐漸形成網絡，在香港建立黃色經濟圈。同樣，一些在海外的香港商人希望建立海外香港人商會，希望從商家角度出發，為商人提供訓練、開拓資源，希望由「做好生意」來維繫建全的香港商家網絡。如阿梓所言：「香港好多人好叻做生意！」如果海外離散群體要健康、持續運作，除了學生、地區、專業組織，海外香港人商會亦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經濟發展與香港人身份從來都是環環相扣。在上世紀七、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蓬勃，漸漸確立為亞洲、世界國際金融中心，「住唐樓、養番狗」的香港中產階級漸漸成型，這一群香港中產多半是順勢成功創業、或者由草根階層成功晉身專業人士的一群。經濟發展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基石，經濟起飛之後市民生活富裕，配合八、九十年代「港人治港」的政治氛圍，市民對於文化自由人權的欲望增加，造就香港能夠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香港化」、「香港人」身份。即使現今我們難以寄望可以在海外完全重建已被政權搞得支離破碎的公民社會，但增強海外香港商人的網絡，對香港離散群體的發展有莫大的支持。



## 海外創業之道

經營生意艱難，而阿梓和她的柏檔都是亞裔女性移民，首次創業的三人何以能夠在三、四年間令業務蒸蒸日上，她們有什麼經營之道？阿梓創立雞尾酒店前並沒有任何商業管理經驗，她在大學修讀工程，兼職期間遇上現今的生意拍檔。阿梓知道自己不太喜歡工程行業大部分比較死板、常規的工作，對在企業打工沒太大好感，於是決意在大學中途停學一年，跟拍檔入貨、籌辦自己的雞尾酒店。事實上，當老闆並不是我們時常想像中般「印印腳收錢」，阿梓說她經常由早上工作至深夜，非常困身。她和拍檔出身小康，搞生意全靠二人之力，家人最多從旁搖旗吶喊。但她和拍檔有一致的創業決心，搞品牌入貨、裝修門面、行政審批、員工管理、特許經營權等等都是兩人自己學習。

阿梓對於她的顧客有準確的理解，這一點對品牌、產品定位尤關重要。她和拍檔在開業前第一件事便是借用相熟的川菜館一角，帶著飲料去做市場調查，搜集顧客品味的有關資料。阿梓的三間店舖，尤以唐人街一店生意最好、增長最快，但服務對象主要是美國人。她不諱言，中國人生意難做，他們知道你懂中文的時候特別態度差。於是阿梓決不對外讓人知道她懂得中文，無論對待員工、客人一致使用英語。而她知道美國人的口味不同，細微的東西例如甜度、質感便需要經過反覆調正。

在員工管理方面，阿梓亦有一套她的看法。阿梓在香港長大，初中時在香港讀書，她認為比較香港人，美國人整體來說思想較簡單、學習速度較慢，例如有些員工在分辨不同酒類這種簡單工作上也有困難。美國員工大多不懂“multitask”（多工處理）、抗壓能力較弱。她們某分店的店長是一位韓裔美國人，從小在美國比較輕鬆自在的環境長大，於是若店舖人流稍多、在壓力底下便容易慌張失措，經常“messed things up”阿梓這樣形容。因此她和拍檔便盡力親自落手看舖，亦在培訓員工方面多下些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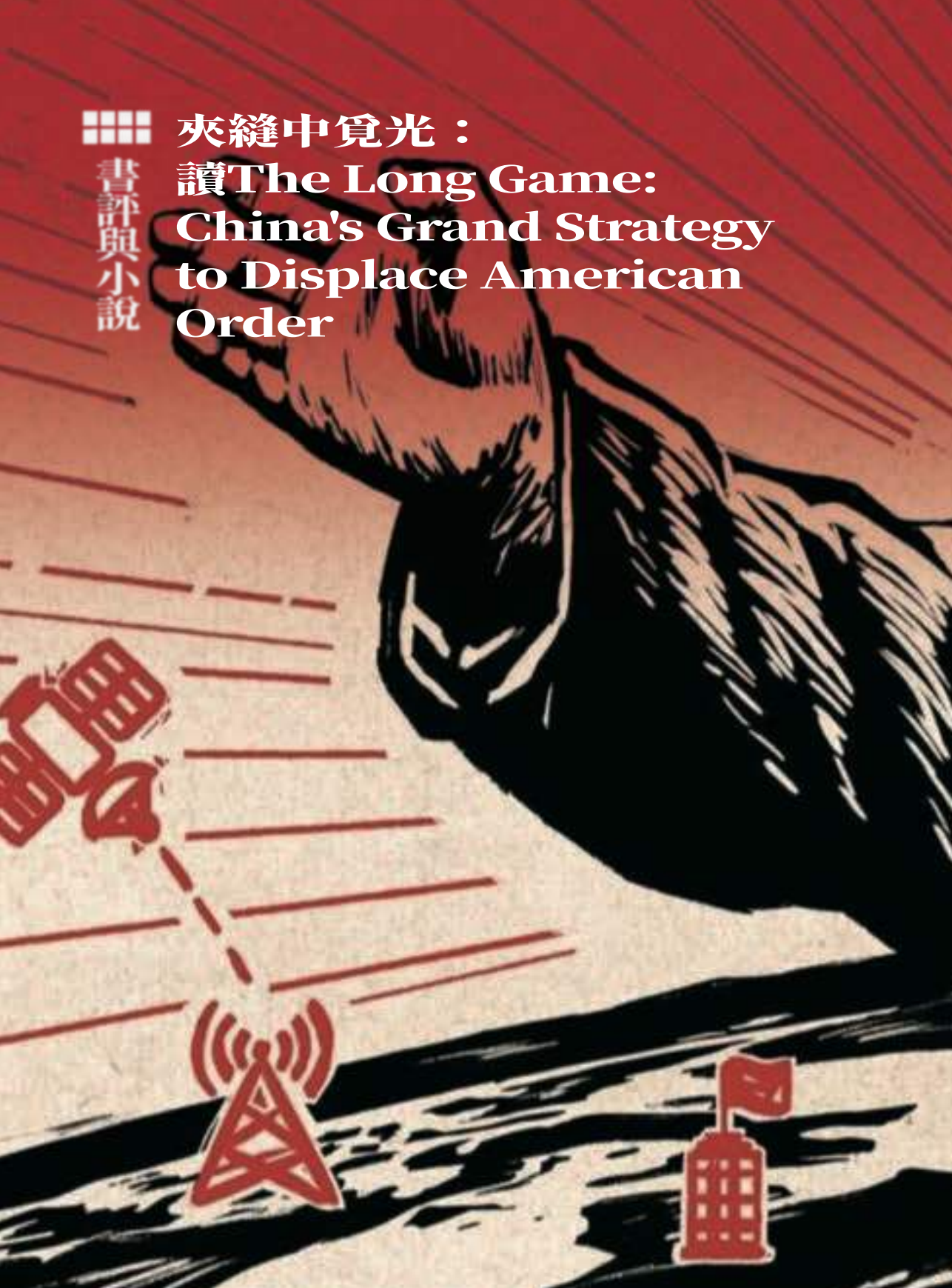
在阿梓的創業路上，她和柏檔基本上由入貨、開舖、請人等等所有大小事情都是透過自己「邊做邊學」。在男人當道的商界，她們兩位年輕女性周邊沒有相類似的商人朋友，二人只能互相扶持。例如香港貿發局針對在阿梓身處的一區曾經建立一些商會網絡，阿梓參加過他們的雞尾酒會，與會者幾乎全部一致為白人男人，她在那裡沒有認識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她和柏檔對於已經陳腐、由上一代商人主導的唐人街商會亦不感興趣。參加唐人街商會或可能有機會從中國領事館、政府獲得第一手商務消息，但商會只會在幾乎已絕跡的實體報章上為會員作宣傳。所以，即使在商言商來說，阿梓也覺得沒有太多誘因參加。幸好，美國現時很多企業對於性別、少數族裔方面加強關注，例如有知名跨國日本時裝品牌因應發揚多元文化精神，曾經邀請阿梓的店舖為企業活動供應數百杯飲料。而阿梓和柏檔亦希望她們可以把收入回饋當地社區，特別是扶助弱勢。她們正在籌備加強品牌社會效益方面的發展，例如將部分收入用作支援女性、少數族裔的企業，或為員工設立獎學金。

阿梓創業的成功之道在於她很清楚自己的脾性，然後與信任的柏檔心無旁騖地向目標進發。她憑著個人實力和努力突破性別和種族的限制，在異國打造一片天地。阿梓除了胸懷大志，亦是懂得發財立品的一位「港女」。雖然她的生意與香港不相罕，但她為了壯大香港商人在海外的聲勢，她冒險參與剛起爐灶的海外香港商會。她亦樂於與其他同路人分享經驗，在商會開工作坊分享營商之道，扶助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相信，阿梓的故事，以後將會是許許多多海外香港人的故事。

書評與小說

夾縫中覓光：  
讀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作者 | 則

# 夾縫中覓光：讀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作者 / 則

一直以來，有部分的學者在論說香港時，都會把香港置於「帝國的夾縫」之中——指出超級大國的行為和動機是研究有關本地的社經現象、政治和歷史事件不可或缺的元素。縱使各人的方法學及理論結構不盡相同，但他們都相信英國、美國和中國等「帝國」對香港的發展歷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亦視香港作為大國之間互動、角力過程的舞台。本地政策轉變、產業結構、城市規劃等等與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的事物，其實都只是在這舞台上演的「戲碼」，由「帝國」的編劇為香港人「設計」的生活。對於這一個狀態，香港人以往除了接受、理解、分析之外，似乎未能超越在論述超越，或行動上改變這個狀態。換句話說，某程度上「帝國夾縫」成為了定義香港的「特徵」，一個香港人無法參與訂定，無法否定，但又未能改變的特徵。

然而，二零一九年革命中「國際線」的嘗試似乎在這個框架中找到生機。不論是出席海外政府的聽證會、進行游說工作、效法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地區發起「香港之路」以及在網絡上建立港人對全球發佈革命資訊的新聞情報網絡，港人希望以行動證明了即使處於「夾縫」之中，上映的戲碼也不必定是由「帝國」全盤決定。「國際線」的潛力不但在於能夠用於爭取本地發展的主導權，將權力歸還人民，更有可能左右大國的外交政策，動搖國際格局，根本性改變香港的位置。雖然這些行動及背後的理論未令香港脫離處於「帝國夾縫」的狀態（因為正正是香港在「帝國夾縫」中的位置，才賦予這些手段相關的影響力（leverage），但它們卻有著動搖而非加固現有體制的潛能。）



今後，如果要繼續發展這種潛能，甚至以打破這個框架為目標，其中一個方向是我們應該了解清楚這個境況的「真相」。換句話說，我們或須回答這「夾縫」具體來說「是」甚麼？「帝國」的具體行為又代表了怎樣的動機。它們想要甚麼？而「香港」在它們追求相關目標時又會或應擔任一個怎樣的角色？當然，這些問題的複雜程度，非本文或一兩本專著便能夠解決。此文旨在回顧一本相關書籍之餘，希望提出一個回答「香港應往何處去」這問題的思考方向。

## 中共的長期部署

現屆美國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 Rush Doshi(杜如松)去年推出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一書。此書利用大量中共官方及相關單位的第一手紀錄及資料，揭露中共過去三十年的「大戰略」，論證中共如何一直部署取代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首先，此書以「中共的大戰略確實存在」為前提，將 1990 年至 2019 年分為三個戰略階段。三個階段分別以「削弱」、「建立」及「擴張」作為其目標。第一階段由被稱為「三重奏」的八九民運、海灣戰爭及蘇聯瓦解事件觸發，令中共決定開始削弱美國在東亞秩序的影響力。其後，因應 2007 年的金融海嘯，中共將對美戰略轉為以「建立」自身在東亞地區的實力為首要目標。最後，當英國公投離開歐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 2020 年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之際，中共觀察到西方國家的國力正在大幅衰退，繼而採取更進取的「擴張」策略，期望在 2049 年，中共建政一百年之前，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國。

杜如松指出，推動中共審視及調整這些戰略方向的條件在於他們如何評估(perceive)中美雙方在軍事、政治及經濟領域上的差距。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蘇聯瓦解，中國首當其衝成為「共產陣營」的代表。中共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亦將會慢慢由對抗蘇聯的盟友演變成潛在的競爭對手甚或是敵人。然而，由於他們認為兩國之間的實力差異仍然巨大，為免打草驚蛇，

中國在當時只能「韜光養晦」，只期望在特定領域削減美國對中的威脅。舉例說在軍事層面，為了避免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懷疑，中共沒有全方位大幅擴張軍備，而只是針對美軍弱點集中發展水雷、潛艇及反艦彈道導彈 (ASBMs) 等裝備。在政治層面，為了防範周邊國家提早對中國出現戒心，他們主要要處理的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及當時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在執行上，他們一邊沖淡有著美國參與的亞洲跨國組織的影響力，一邊推動那些美國沒有參與的組織的體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向亞洲各國示好以拉攏其支持。

如是者直到零七年的金融海嘯，在重新評估下，中共認為中美的實力差距已大幅收窄，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逐漸減少。於是，在江澤民、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共開始跟隨「積極有所作為」戰略精神。以建立全新東亞秩序為目標，他們開發航空母艦、發展海上基地、設立亞洲投資銀行、推動「一帶一路」等政策。最後，因應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武漢肺炎疫情，作者指出現時在中共視角下美國正步入國力衰退期。對中共而言，這是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後，作者預期中共將採取「擴張」戰略，以「復興中華民族」作說詞，向成為世界領袖的目標進發。

## 小心服用

縱使該書作者持有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在書中亦多次強調自己的著書方法是依照社會科學的精神，筆者仍建議各位觀眾要「小心服用」此書。美中不足的是，書中所援引的資料，雖然數量龐大，但只涵蓋中共一方的想法、判斷及行動。在中共旨力取代美國秩序的三十年間，很難想像美國毫無對策。那麼，在中共「韜光養晦」之時，美國政府究竟如何判斷兩國關係？經歷過六四屠城後，美國曾一度以經濟制裁要脅中國必須重視人權問題。但為何美國仍然會在 2002 年通過對中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 亦即是俗稱的「最惠國待遇」？當中涉及的是美方對中共戰略的誤判，引致放虎歸山嗎？抑或是，從來中美兩方的利益都是一致呢？相比起中共內部文件，作者理應更容易接觸到更大量、全面的美方外交政策文件，在這情況下，本作缺乏對美方的回顧似乎令人大失所望。究竟作者是不為之，還是不能為之？相信就只有作者本人能夠回答。

另外，此書所依賴的方法框架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在談論中共藉著對「中美兩方實力差距」的評估而作出相應的戰略部署時，書中似乎未有說明中共實際是怎樣進行評估，有甚麼具體數據、指標對他們而言是比較重要的。除了將中共相關的言論文件依其權威性分門別類之外，讀者實在難以得知那些文件的「權威級數」跟實質政策之間的關係。舉例說，如果我們能夠將官方言論文件與經濟數據對讀，我們或能得知某些使中共改變的關鍵因素。要分析中共的行為，動機，這種研究其實是不可或缺。不然，我們對其行為的詮釋只會流於表面的官方文件「文本分析」。

當然，縱使不足，亦不代表此書毫無參考價值。至少作為起點，本作為我們示範一個研究中共可行的方向。要了解「帝國」的實況，我們可以建構現有體制的「系譜」，溯流追源發掘體制在過去的演變過程，辨識出哪種力量、因素掌控現有制度出現及狀態。我們在揭示現有境況其實並非自有永有的同時，我們可以問為甚麼它們看來「非如此不何」，甚至這亦鼓勵我們去探尋暫時無法想像的全新格局。

而對於所有有志思考香港未來出路的朋友，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下去探尋答案。我們不但要了解國際格局下「帝國」之間的互動，更進一步，若然今後人類將繼續以「國際棋盤」用理解由各現代民族國家所建立的世界體系，面對這個「國際棋盤」，究竟香港能否、又應否只成為其中一枚棋子呢？又或許，如果無可避免地我們必須要回到「帝國夾縫」的框架內，早前對「帝國」的分析又有甚麼幫助呢？最後，筆者希望提醒，縱然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但尋求這些答案的過程注定是漫長的。要發掘「真相」，除了要有「活著的勇氣」堅持不懈去探尋之外，我們或應「效法」中共——要有「韜光養晦的勇氣」。



